

“也是学梵文的”

——周一良的梵文研究及其与季羨林的早期学谊*

陈 明

摘 要：中国早期东方学的重镇是在北京大学，尤其以1946年8月北大文学院新设的东方语文学系堪称学科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东方学的发展不仅与季羨林、马坚、金克木等一批系内学者有关，还离不开系外多位与东方学研究相关学者所做的贡献。本文以周一良和季羨林的早期学谊为考察点，不仅回顾周一良的梵文学习和研究经历，揭示学者之间的交往及友好情谊，更重要的是爬梳他们共同创办中国东方语文学会与学术演讲及拟办刊物等活动，揭示他们在学科发展过程中的成就与遗憾，以丰富对学科史的深层认识。

关键词：周一良 季羨林 梵文学习 中国东方学 学科史

中国早期东方学的重镇是在北京大学，尤其以1946年8月北大文学院新设的东方语文学系堪称学科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该系成立以来，北大不仅涌现了季羨林、马坚、金克木等一批系内的东方学家，而且还有该系之外的多位与东方学研究相关的重量级学者，周一良（1913—2001）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回顾中国东方学学科史的历程，也有必要梳理周一良在其中的贡献，本文以周一良和季羨林的早期学谊为考察点，不仅是揭示学者之间的交往，更重要的是揭示他们在学科发展过程中的成就与遗憾，以丰富对学科史的认识。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B084）阶段成果之一。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感谢王邦维教授、学友孟繁之、荣宏君，以及清华大学档案馆对本文提供的帮助！谨以此文纪念周一良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2001年3月14日，周一良在口述的《〈季羨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序》中回忆：“回想1946年春，陈寅恪先生在欧洲治疗眼疾，不幸未成功，取道美洲返国。赵元任先生夫妇从剑桥开车去纽约码头，探望睡在普通舱、没有下船的陈先生。我与杨联陞兄随同前往。就是这次从陈先生口中听说在德国学习梵文的季羨林先生。这已是五十五年前的事了。1946年秋，我回到北平，在北大红楼得识季羨林兄，两人共同语言很多，问题看法往往一致。以后往来踪迹虽不密切，但似乎心心相通。”^①

陈寅恪1945年10月抵达伦敦求医治眼。在英国期间，他刚好与季羨林（1911—2009）有书信联系。1946年1月9日早上，季羨林“到楼下图书室去写给陈寅恪先生一封信，思路非常涩滞，仿佛自己连中文都不能写了。回屋走了一趟，回去觉得思路又顺了，才把信写完”。1月23日下午，季羨林“写给汤用彤先生一封信，因为陈寅恪先生写信告诉我说北大想设东方语言系，让我把学历著作寄去”。1月25日，季羨林“吃过早点，把写给汤锡予先生的信抄好。……吃过午饭，回来写给陈寅恪先生一封信。……五点到邮局，把给陈汤两位先生的信寄走”^②。陈寅恪推荐季羨林到北京大学文学院拟成立的东方语文学系任教，因此，4月19日下午，当陈寅恪在纽约“卜汝克临二十六号码头停泊之轮舟中”遇到计划回国任教的周一良时^③，就向他提起了季羨林。

1947年1月10日，周一良到北大来看望校长胡适，将其父周叔弢（1891—1984）收藏的一本《水经注》带给他做研究^④。据季羨林当天的日记：“吃完晚饭回来，马祖圣、邓嗣禹同了周一良来，周也是学梵文的。不久长之来，周先走了，长之谈到九点多

① 周一良：《〈季羨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序》，收入《郊叟曝言》，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49—151页。

② 季羨林：《季羨林日记：留德岁月》第六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86、1892页。

③ 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34页。

④ 胡适的跋语：“卅六年一月十日周一良先生来看我，把他家叔弢先生收藏的一本东原自定《水经》一卷带来给我研究。”（周一良：《追忆胡适之先生》，收入《郊叟曝言》，第5页）

才走。”^①这是周一良1946年10月从哈佛大学归国之后，与季羨林的第一次会面。

周、季两人年龄相若，学术背景相似，互相引为同道，如周一良所言，两人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对不少问题的看法往往一致，虽交往不是特别密切，但成为可以过心的朋友，此后在东方学研究领域也多有交流和合作。

一、周一良在哈佛大学时学习梵文的经历

（一）周一良的家庭教育及其在燕京大学的学习

周一良与季羨林的学术交集点在于梵文，尤其是与之相关的佛教史与佛教文献研究。季羨林的求学经历较为简单，出身平凡的他在山东济南念了中学之后，1930年同时报考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均被录取。^②他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语言文学。大学四年毕业后，季羨林回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国文教员。1935年6月，季羨林考取赴德交换研究生资格，9月到哥廷根大学留学，不久开始攻读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③1941年2月，完成博士论文《〈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获得学位。二战期间，季羨林滞留德国，直到1946年5月回到上海，同年9月底到北京大学报到任教。

周一良的中小学阶段则完全不同，接受的是家庭安排的私塾教育。其曾祖父周馥（1837—1921）是出任过山东巡抚、两广总督的封疆大吏，也被称作晚清洋务运动后期的操盘手之一。父亲周叔弢既是精明强干的实业家，也是对中外新旧学问有深度兴趣的学者，翻译过大哲

① 季羨林：《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羨林归国日记（1946—1947）》，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144页。长之，即李长之。

② 《国立北京大学布告》，《北京大学日刊》第2454号，1930年8月2日第1版。

③ 季羨林：《留德十年》，上海：东方出版社，1992年。李雪涛：《季羨林先生的学术发轫——对1935—1940年间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学所选课程的考察》，《中国文化》第54期（2021年秋季号），第152—173页。

学家康德的著作，还是“爱书如命”的藏书家。其家族的特点就是注重藏书和极为重视子女的家庭教育。作为弢翁的长子，周一良所受的童蒙与大学前的教育，基本上是按照弢翁拟定的理想教育模式进行的。在奠定中国传统文史教育的基石上，吸收西学新知，培植外国语言学的素养，走中西兼通之路。周一良的日文、英文学习也是家庭教育的组成部分。十五岁时，周一良在《释家补正》和《〈文镜秘府论〉校勘记》等五篇文章后面所写的四则札记，就充分体现了他所受的良好家庭私塾教育。这样的家庭培养模式为周一良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①。其家学不仅对他从事史学研究有很深的影响^②，他和二叔周叔迦的佛教学习及研究也受过弢翁的影响。

1930年，周一良“离家塾考入燕京大学所办训练中学教员的二年制国文专修科”^③。燕京大学编《私立燕京大学一览》（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年度）的“学生姓名录”之“男生”部分记载：“30604 周一良 文国专 安徽秋浦”^④。1931年8月，辅仁大学新招收各院系科的一年级新生一百四十七名，周一良榜上有名。^⑤因辅仁大学对一年级新生关注不够，且“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与功名心”，周一良遂于1932年秋转学到燕京大学历史系，就读二年级。

教过周一良的燕京大学老师主要有洪业（煨莲，1893—1980）、邓之诚（1889—1960）、顾颉刚等人。其中，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是从洪煨莲处所得，他开设了“初级历史方法”“高级历史方法”和“远东史”三门课。洪煨莲的治史业绩受到国内学界及海外汉学家的推崇。邓之诚《送洪煨莲赴美讲学序》中对其学术特点有精到的描述：

① 刘桂生：《周一良早年收藏的〈国学月报〉和四则读书札记》，《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82—85页。

② 汪谦干：《家学与周一良的治史》，《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123—126页；王彬彬：《家学对周一良早年治史的影响》，《作家天地》2021年第36期。

③ 周一良：《燕大校史上被遗忘的一页——国文专修科》，收入《周一良集》第五卷《杂论与杂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52—456页。

④ 燕京大学编：《私立燕京大学一览》（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年度），燕京大学，1931年，第298页。

⑤ 《辅大新生揭晓》，《华北日报》1931年8月4日第六版。

洪子少承庭训，读儒书。及长，服习愈勤，于学无所不窥，尤专精于史，著书满家。……盖其为学，有西人之密，兼乾嘉诸儒之矜慎，实事求是，取材博，断案谨，无穿凿附会之蔽、扬己抑人之习。所以得人尊信者，此也。^①

周一良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的“引进门的师傅”则是邓之诚。他课后与邓之诚也有往来。1933年11月28日，“张维华、邓嗣禹、周一良来”看望邓之诚。^②1934年3月6日，邓之诚“为周一良、邓嗣禹改所作文”^③。此文应该是指周一良的《魏收之史学》一文。该文随即刊于《燕京学报》第18期。^④周一良这篇大三时期的习作是他的史学研究处女作，曾广受好评。^⑤1935年4月23日，邓之诚“招周一良、王钟翰，属其从《通志》（《清通志》）中查乾嘉以后书院建置及人才成就，限钟山、诂经、学海，后来南菁、尊经、船山、问经、莲池、龙门诸院不遍及也。”^⑥从邓之诚的日记来看，周一良不如邓嗣禹与他的关系密切，但也超过一般的学生。

周一良与燕京大学国文系的容庚（1894—1983）教授也有往来。1932年11月2日，顾廷龙从容庚的书记员瞿润缙（字子陵）处，“借《娱妻记》，Thomas Hardy所著，周一良物也。携归展读，有中文对照，尚易读。”^⑦1933年2月21日，容庚“午约张石公、周一良、瞿润缙、顾颉刚便饭。”这是容庚为瞿润缙转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而举办的饯行。9月21日，容庚“结《卜辞》账，与瞿合赠送者：商锡永、……

①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364—366页。

② 同上书，第27页。

③ 同上书，第34页。

④ 周一良：《魏收之史学》，《燕京学报》第18期，1934年，第128—167页。

⑤ 吴小如：《读〈魏收之史学〉——〈周一良集〉札记之三》，《书品》2002年第3期，第63—65页。

⑥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册，第68—69页。

⑦ 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第10页。

马叔平，共六部。……瞿又赠顾起潜一部、周一良一部”^①。《卜辞》是容庚与瞿润缙合编的《殷契卜辞》。该书由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在北平印行。瞿润缙单独赠送一部三册的《殷契卜辞》石印本给同班同学周一良，是因为周一良与他有过合作，“他的论文《释彣》在《中山大学学报》发表，附载了我的一篇补充性跋文，这是我附骥尾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字”^②。1935年5月2日，“周一良、陈梦家来”。8月11日，“十一时乘平汉车往石家庄，同行者：马鉴、周一良及田洪都夫妇”。至8月20日返回北平，容庚此行游历所到之处有太原、晋祠、天龙山、太谷、祁县、子洪镇、车趾、石家庄。^③1936年5月22日，“午时在洪宅商史学系研究生事，并聚餐”。此次在洪煊莲家的商议应该也与周一良有些关系。6月21日，“邓懿、周一良来”^④。

与周一良关系不错的老师还有顾颉刚。1932年12月9日，顾颉刚的日记中评价了几位学生的情况：“燕大史学系学生，以齐思和、翁独健、冯家昇、谭其骧四君为出类拔萃之人物。惟谭君为嘉兴人，不能用苦功，他三人将来必有成就。”^⑤惟此时的周一良刚转学不久，尚未进入顾颉刚的法眼。顾颉刚此后的日记中，也数次出现了周一良的身影。1933年2月21日，顾颉刚“到容宅吃饭”，“今午同席：张石公先生、子陵、周一良、予（以上客）；希白兄妹（主）。”2月22日，“子陵来，周一良来，均留饭”^⑥。1934年2月4日，“嗣禹约往海淀斌泰酒店吃饭。……今晚同席：谭季龙、周一良、予（以上客）；邓嗣禹（泰初）（主）。席中定出版《禹贡半月刊》出版计划。斌泰为海淀老酒店，卖黄酒，有百余年之历史”^⑦。“邓嗣禹”名后所列的字号“泰初”，可能

① 容庚：《容庚北平日记》，夏和顺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302、329页。

②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5页。

③ 容庚：《容庚北平日记》，第413—414、427—428页。

④ 同上书，第460、464页。

⑤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二卷（1927—193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718页。

⑥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三卷（1933—1937），第17页。

⑦ 同上书，第157—158页。

是周一良的字“太初”之误，因为邓嗣禹的字是“持字”。2月14日，“广顺来。邓嗣禹、周一良来”。2月28日，顾颉刚“到汽车行，晤周一良、徐宝谦等”。3月17日，“写家升、一良信”。12月2日，“嗣禹偕周一良来”^①。1935年5月13日，“一良来”。5月16日，顾颉刚“到穆楼，听适之先生演讲颜元”^②。次日，顾颉刚向胡适推荐即将本科毕业的周一良，该函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昨日匆匆，忘述一事：

燕大历史系有一周一良君（安徽人，大约是周学熙的孙子），学业很好，于今夏毕业，下半年他想留学东京帝大（他的日文很好）。不幸帝大只承认中国六个国立大学，燕大不在其内，大学毕业没有资格进他们的研究院。因此，他托我转求先生，可否到北大来尽半年多的义务（最好是助教名义，或史学系，或研究所），不要钱，白作事，但求明年四月东渡时，可以拿出北大证明书给他们看。所谓证明者，即是北大的聘书或校长、文学院长的证明函件。他因为家庭教育好，所以他的英文、日文都好，对于考古学、文字学都有造就。先生能提拔这人，一定是值得的。

学生顾颉刚上。二十四、五、十七^③

胡适的日记中未见对此推荐信的回应。周一良毕业之后，获得哈燕奖学金，入燕京大学研究院。1935年6月22日，顾颉刚日记中披露了领奖学金的学生名单：

①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三卷（1933—1937），第160、164、169、267页。

② 同上书，第343页。这是胡适在燕大系列讲座“颜李学派”（共三讲）的第二讲。胡适当天的日记：“下午到燕京讲颜元。”参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1934—193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205页。

③ 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88页。

今日决定奖学金领受学生：

国文系：李素英（继续）、李文郁、陈梦家、周杲、（后补）
张玮瑛

历史系：卞平樟、周一良、张家驹、刘选民、（后补）姚家积

哲学系：朱宝昌^①

6月29日，顾颉刚“到嗣禹卧室访季龙，并晤一良”。10月4日，顾颉刚“乘六时车归，遇周一良”^②。周一良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大日本史〉之史学》，刊发于《史学年报》。既敷《介绍〈史学年报〉》一文中，对周一良的论文评介颇高：

周一良《〈大日本史〉之史学》：《大日本史》，创修于日本水户藩主德川光，自开馆以迄完成，凡历二百五十十年，叙神武天皇至后小松天皇间事，凡三百九十七卷，为彼邦史学巨制。周先生精日文，于史学造诣颇深。是篇述大日本以前之日本史学，《大日本史》编纂始末，甚为详细；而其批评《大日本史》之各点，尤具卓识。^③

1936年1月23日，周一良发表了书评《评杨铨译〈长安史迹考〉》，指出足立喜六《长安史迹之研究》的杨铨汉译本《长安史迹考》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他认为“杨氏译文中错误屡见，至足惊詫”^④。5月21日，《华北日报》第九版《燕大本年度领受荣誉奖金者 数十位男女士欣然色喜》刊载了“受奖人姓名”：

①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三卷（1933—1937），第358页。

② 同上书，第360、396页。

③ 既敷：《介绍〈史学年报〉》，《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11月8日第十一版“史地周刊”。

④ 周一良：《评杨铨译〈长安史迹考〉》，《大公报天津版》1936年1月23日第九版“图书副刊”。

(一) 哈佛燕京留交额及奖金, 由博晨光教授报告。自一九三五至三六年共十四人, 计研究生张家驹、张玮瑛、陈梦家、周果、周一良、朱宝昌、邝平樟、刘选民(以上为第一年研究员); 李素英(本年为第三次); 蒙思明(仅领一部份); 高名凯(仅领一季)。研究员计有邓嗣禹(本年为第三次)、杨荫浏及翁独健。……

作为燕京大学研究院的研究生, 周一良名列十四位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的名单之中。7月2日, 在顾颉刚家, “一良、家驹来。”^①当年的《燕京大学学生名录》中记载:

35504 Chou I Liang 周一良 历史研 安徽至德 一楼^②

在读了一年的研究生之后, 尚未毕业的周一良就被陈寅恪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周一良读研时的双导师是洪业和容庚, 拟写的学位论文题目是《日本史资料辑要》。据当年的《私立燕京大学研究院概况》(见表一):

表一 燕京大学研究院学生题名录(摘录)^③

学部	姓名	性别		论文题目	导师
历史	张玮瑛	女		清代漕运	邓之诚、容庚
	周一良	男	休学	日本史资料辑要	洪业、容庚
	侯仁之	男		天下郡国利病书补续·山东之部	洪业、顾颉刚

办理了休学手续的周一良, 在中央研究院如鱼得水。但由于时局

①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三卷(1933—1937), 第499页。

② 燕京大学编:《燕京大学学生名录》, 燕京大学, 1936年, 第7页。

③ 燕京大学研究院编:《私立燕京大学研究院概况》(民国二十五年年度), 燕京大学研究院, 1936年, 第17页。

的变化，他未能再返回燕大去完成学位论文。1937年1月31日，在南京，顾颉刚“到研究院，晤骝先、槃庵、一良、贞一、毅侯。回旅馆”^①。3月21日，顾颉刚“与履安、起潜叔夫妇同到崇文门正昌饭店吃饭”，“今晚又同席：煨莲、希白夫妇、绍虞夫妇、仁之、玮瑛、羨季、起潜叔夫妇、选民、润缙、士嘉，共约七十人。周一良、邓懿（订婚人）”^②。当天周一良和女友邓懿订婚，邀请了师友亲朋约七十人，场面不可谓小。在北平订婚之后，周一良仍回到南京，在史语所从事研究，当年购买了《洛阳伽蓝记》（该书题记“廿六年四月一良记于南京北极阁下”）、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题记“周一良，廿六年四月廿五日于南京”）、冯承钧译《中国之旅行家》（题记“一良，廿六年五月于南京”）等书籍。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8月16日，清华大学教授吴宓“遇周一良与邓懿女士，知槐树街四号景珊、叔昭宅业已代为结束”^③。

1935年，周一良首次去清华大学旁听陈寅恪先生的课，深受震撼，从此更明确了自己的研究兴趣。他原本的志向是研究日本史，而不是比较文学，之后便对梵文和佛学、敦煌研究逐渐着迷。周一良学习梵文的外在动因有以下两点：

其一，就是他想追随非常崇拜的陈寅恪先生的学术之路，而“学习梵文等文字，肯定有助于走他的道路”^④。1983年1月29日，周一良致函老友谭其骧时还提及此事：“一良夙昔服膺寅恪先生，在美习梵文学佛经，亦由于志在走寅老道路。但资质远非寅老之比，亦非上述诸公之比。故解放前虽努力而成就有限。”^⑤

无独有偶，季羨林就读清华大学时（1930—1934）想学梵文也与

①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三卷（1933—1937），第592页。

② 同上书，第621页。

③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六册（1936—1938），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98页。

④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9页。

⑤ 赵和平主编：《周一良全集》第十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50页。

陈寅恪先生有关。季羨林《我是怎样研究起梵文的》一文中的说法是：“我曾同几个同学拜谒陈先生，请他开梵文课。他明确答复，他不能开。”^①季羨林现存的《清华园日记》并不是他四年大学生涯的完整记录，其中并未有选修陈寅恪课程的记载。1936年秋，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学将所修的主专业从“德国语文学”改为“印度学”，终于圆了学梵文的梦想。有关此事的因缘，季羨林晚年的回忆文章中，常称自己学梵文是受陈寅恪所授“佛经翻译文学”课程的直接影响。^②1933年8月29日，季羨林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未来想从事的学术方向：“中国文学批评史、德国文学、印度文学及 Sanskrit。三者之一，必定要认真干一下。最近我忽然对 Sanskrit 发生了兴趣，大概听 Ecke 谈到林藜光的原因罢。”^③可见，季羨林当时想到梵文，并不是因为仅仅听了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课而来。Ecke，即德籍教授艾克（Gustav Ecke，1896—1971，又名艾锷风），他1928年下学期入聘清华。《吴宓日记》记载1928年10月17日下午“4—6在 Winter 室中茶叙，并晤新来之 Dr. Ecke。”11月9日又记载：“晚7—10访 Winter，并晤 Ecke 德国人，博士，新聘教授。”^④Winter（温德），即 Robert Winter（1887—1987），时任清华大学英语教授。^⑤艾锷风当时向学生们提到林藜光，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在钢和泰家中研读梵汉佛典班的成员，而且1933年夏林藜光远赴法国巴黎去学习印度学和梵汉佛教典籍。

其二，当时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许地山教授曾开设过梵文课。周

① 季羨林：《我是怎样研究起梵文的》，《书林》（上海）1980年第4期，第18页。又，季羨林在《口述史》（2008年11月1日下午）也是这么说的：“当时，我们几个学生，就请这个陈寅恪先生开梵文课，陈寅恪先生说我不开了，我不是研究语言学的。”（季羨林口述，蔡德贵整理：《季羨林口述史：大国学》，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7页）

② 季羨林：《学海泛槎——季羨林自述》，北京：华艺出版社，2005年，第73页。季羨林：《留德十年》，第48页。

③ 季羨林著，叶新校注：《清华园日记（全本 校注版）》，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第151页。

④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四册（1928—1929年），第147、159页。

⑤ 参见〔美〕伯特·斯特恩著《温德先生：亲历中国六十年的传奇教授》，马小悟、余婉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一良《毕竟是书生》中有对当年情况的回忆：“1930年初进燕京国立专修科时，看见宗教学院课程表上有许地山先生讲授的梵文，兴致勃勃去签名选修。谁知选修的学生太少，没有开成。”^①虽然没有机会在国内学习梵文，但是周一良在心中扎下了想学梵文的念头。

（二）周一良留学哈佛与梵文学习

1939年，作为燕京大学的师资梯队培养人才^②，周一良受洪煊莲教授推荐，领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赴哈佛大学留学，以便毕业后回燕大任教。出国前夕，4月24日周一良致函傅斯年，对去哈佛留学，他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美洲汉学远非法德之比，于一良所学恐无多裨补，虽涉重洋，其孤陋谅与居津相等。”另一方面，他觉得“然在中国文史以外，如东亚史地以及宗教美术诸课程，或有可供采撷者。外国语文方面亦可进步一二”^③。而能够学习梵文也是他愿去哈佛的主要原因之一。周一良在《中国文化书院访谈录》中有如下的回忆：

另外还有一种想法，我还是很崇拜陈寅恪先生的，想走他的道路，我知道他曾经在美国、在德国学梵文，就是古代印度文，然后用梵文的知识回来再研究中国的佛教，研究中国的文化史。我想我要到哈佛去，我也可以学梵文，在国内没有机会了，到哈佛去以后可以有这个机会。我虽然是去哈佛，我还可以继续走陈寅恪先生所走的道路，我学他所学的东西，将来回来还可以研究他所搞的这个范围。^④

1939年9月17日，周一良致函傅斯年，汇报到哈佛之后的选课情

①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第32页。

② 赵和平主编：《周一良全集》第七册，第135—136页。

③ 赵和平主编：《周一良全集》第十册，第16页。

④ 赵和平主编：《周一良全集》第七册，第136页。

况：“课程已选定法文、东洋美术及日英翻译三门，尚须补习拉丁，以备明年选读一二西洋历史科目，德文及梵文亦须待明年选习，大约此行最大收获端在语言方面矣。”^①

1940年11月13日，周一良又致函在四川李庄的傅斯年，汇报了在哈佛的语言学习情况：

一良未来哈佛前本无大志，但谓习得一二工具如法德文字，即不虚此行。去年所习课程为日英翻译、法文、梵文及语言史。因梵文对治中国中古历史颇有用，在国内复无处可学者也。今年暑假仍续读法文，开学后除续选日英翻译及梵文外，并习希腊、拉丁及德文，故异常忙碌。日英翻译为本系主修课程，然大部分时力反用于其他语言。哈燕诸公主张治东方语文非娴西方语言之学不可，而欲窥西洋语言学之门径，又非解希腊拉丁文不可。故今年迫于功令，不得不双管齐下。所幸去岁治梵语用功甚勤，有此根柢。视希腊拉丁有曾经沧海之感，德文更属小巫见大巫矣。唯除梵语、德语外，希腊拉丁从来殊无用处，费此冤枉功夫，未免可惜耳。……能多留一二年，于治梵语最有益，因德法等近代语言有一两年功力即可读书，梵语则不然。一良若能锲而不舍习之四年，庶几归国后稍能独立深造，仅习一二年全无用处也。^②

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中，有“哈佛七年”一节，回忆了当年在导师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或称“爱立才夫”；日文名字“英利世夫”）教授的支持下，没有按燕京大学的安排去攻读比较文学，而是确定以“日文为主、梵文为辅”。周一良跟随科拉克（Walter Clark）教授在哈佛敲开了梵文之门。据周一良哈佛留学时的成绩单显示，他选修的India Philology（印度语文学）就是梵文课，共学习了三年，成绩均

① 赵和平主编：《周一良全集》第十册，第17页。

② 同上书，第18—19页。

为A等（A⁻和A）。因为“主要课程得B等是无法交待的”，周一良在梵文课上不得不加倍努力，因此，老师科拉克称赞他“必然是拼了命”。

周一良在哈佛学梵文时所用的工具书，即莫尼·威廉斯（Monier Monier-Williams）的《梵英大字典》（*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是他父亲寄给他的。“我父亲早年为准备翻译康德著作，购备了不少外文字典，我记得其中有莫尼·威廉斯的《梵英大字典》。在珍珠港事变之前由天津寄到剑桥。藏于自庄严堪三十年的工具书终得其用。”^①周启锐编《周一良读书题记》中也有相关的条目：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此书藏于自庄严堪盖二十年，一良来美治梵文始获用，不知他年能读此书否耶？廿九年四月二日由津与萝厂照片六张，乾儿抓周照片三张同寄到，一良识于剑桥。

一良参考用书。三十八年七月重装订。

周一良在《怀念敬爱的父亲》一文中也有回忆：“由于他（弢翁）对西方哲学文学抱有浓厚兴趣，又有译书计划，所以早年他还搜集了不少西方哲学文学的书籍，以及古语言的字典之类。后来学梵文时，他收藏近三十年而当时已很难买到的一部大型梵英字典，成为我不可缺少的工具书。”^②这也正印证了季羨林对青少年时期周一良的那句评论“读书条件好到无法再好的水平”。

在哈佛与周一良一起学梵文的同学人数较少，但其中不乏知名学者，比如费耐生（Richard N. Frye）、陈观胜等人。他们所学习的内容包括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那罗传（那拉王子故事）、佛经《佛所行赞》与《妙法莲华经》、梵剧《小泥车》等。周启锐编《周一良读书

①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第33页。

② 赵和平主编：《周一良全集》第九册，第81页。

题记》相关的条目如下：

The Little Clay Cart

周一良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八月买于哈佛合作社。

在哈佛学梵文，曾读此剧本原本。但购得英译本后竟未过目。三十年后，写简明世界史教材中印度封建社会一章，始裁读之，亦所谓养兵千日矣。七二年六月记于燕东园。

Auld Lang Syne

尝读书马氏自传及其夫人所辑手札，心仪其人。坊间每见此书，前集记马氏与文学艺术界人交游始末。此集所记则天竺知识，并有关吠陀经文，颇不多见。三十五年五月九日购于美洲剑桥之图亭书店，一良。

（编按：F.Max Muller 著，1902年纽约出版。题记时间在1946年。）

《佛所行赞》

在美曾读庄士敦校本《佛所行赞》，归国后又从自庄严堪旧书篋中检出此册，回并插架。三十六年五月太历元宵夜一良记于天津。

（编按：梵文本，1893年牛津出版。题记时间在1947年。）

《小泥车》

一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收到，昔曾读此剧梵本，忽已十余年矣。

（编按：此书为首陀罗迦著，吴晓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7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①

周一良在哈佛七年，还购买了《薄伽梵歌》（*Bhagavad Gītā*）、《本生鬘》（*Jātaka-Mālā*）等梵本（或英译本）的印度学、佛教学典籍^②。

① 周启锐编：《周一良读书题记》，赵和平主编：《周一良全集》第九册，第417、418、419、427页。

② 王邦维：《记周一良先生所赠西文藏书》，《文汇报》2023年1月7日第八版“文汇学人”。

梵文的学习对周一良撰写并顺利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Tantrism in China*, 汉译《唐代密宗》) 有重要的支撑作用。该论文于1945年刊发《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这篇论文四十年来颇受重视, 有的佛教史参考书目中列为必读, 对我可谓‘不虞之誉’了。”^①关于该英文论文的汉文题目, “太初先生在自己保存的单行本封面上有两条题记: ‘《唐代密宗三僧考》, 一良,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四月印就’, ‘《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发现此册尚存因题’。”^②

周一良的学术水平也得到胡适和傅斯年的认可。1943年10月14日, 胡适在波士顿“下午见陈观胜, 他是学梵文、Pali、藏文、日文的, 现预备比较汉文、梵文、藏文的小乘律”。“晚上在周一良家吃晚饭。同坐的杨联陞、吴保安、任华, 都是此间最深于中国文字历史的人。周夫人亦是有学问的。一良说, 唐文宗第一个年号是大和。不当作太和, 钱大昕曾有考证。”^③1944年6月29日, “戏改杨联陞的‘柳’诗, 却寄杨君及周一良君(我上周去信, 约杨、周两君去北大教书, 他们都有宿约, 不能即来。)”^④。12月16日, 是胡适五十三岁生日的前一天, 他约请了二十一位朋友聚餐, “在座的是赵元任夫妇、周一良夫妇、王恭守夫妇、Mrs Hartman、萨本栋、吴宪、张运福、裘开明、锺兄、馭万、大春、祖望、杨联陞、王岷源、王信忠、鯁兄、张其昀”^⑤。1945年2月10日, 《杨联陞日记》(未刊本) 记载: “晚贾公请客, 有伯希和、胡适之、赵元任、叶理绥、魏楷、张晓峰、裘开明、周一良、张福运及余等。与贾独谈至二时。贾提议作英法之游。”^⑥“贾公”即哈佛

①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 第34页。

② 钱文忠:“译后记”,《周一良集》第叁卷《佛教史与敦煌学》,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 第151页。

③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1940—1952), 第180—181页。

④ 同上书, 第197页。

⑤ 同上书, 第205页。

⑥ 蒋力:《杨联陞别传》,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年, 第231页。

教授汉学家贾德纳 (Charles Sidney Gardner)。周一良在哈佛有机会结交当时国际学界的顶级人物。7月21日,周一良致函胡适,请求对方为自己的第二个新生儿取名。^①10月17日,傅斯年致函胡适,提及要为从昆明复员回到北平的北京大学聘请新锐师资,“史学系:从吾、毅生、子水、向达。非大充实不可。受颐必须拉回,愈早愈好。此系,史语所可以有人补充,周一良、王毓铨、胡先晋,乞先生一斟酌,就地决定。”“周一良甚好,乞先生接洽一下,但他恐非教授不可(也值得)。”^②

梵学知识的积累有益于周一良归国后开展的佛教史、魏晋南北朝史、敦煌文献研究,为他奠定了较为坚实的语言基础。这也让当时的学界同仁多认为周一良是继承陈寅恪先生学问衣钵的最佳人选,即“当时青年学人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杨联陞语)。

二、周一良归国之后的经历及其与 梵文相关的研究

1946年9月,周一良“从金门归国于山猫号舟中读”《李卫公会昌集》。10月,他回到国内,受聘燕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讲授高级、初级日语及佛教翻译文学。11月1日,邓之诚的日记云:“晚,周一良来,新自美国归来也,见之颇喜,久谈始去。”^③11月29日,“周一良来,馈《十经斋遗集》二册,羹持四把”^④。清代沈涛《十经斋遗集》(一函二册)乃1936年7月由周叔弢自庄严堪刊印,其版式颇受学者称道。12月19日,周一良受邀在校内作了一次演讲。《燕京新闻》做了简要的

① 赵和平主编:《周一良全集》第十册,第22页。

② 王泛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三卷,“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第1639—1649页。

③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册,第396页。

④ 同上书,第397页。

报道：“甫由美返国之燕大日文教员周一良应该校益友会之邀，于十九日晚七时讲述‘美国人研究东方语文学之概况’。”^①周一良主要介绍和评述了美国东西部大学在研究汉文方面的不同侧重点。

1947年2月8日，《大公报》（天津版）第六版“大公园地”所收的《艺文往来》，也有一则关于周一良的消息：

刚从哈佛回来的周一良在燕京执教，教佛经。周为北方名藏家周叔弢先生令息。秋浦周氏一门多俊彦，一良叔辈周叔迦先生曩在北大教佛学，不到校上课，同学辄去其家佛堂中，蒲团静坐，相对无言，遂得顿悟，亦北大教授中别开生面者。（R）^②

此消息类似道听途说的轶事，多半是不真实的。周一良在燕大教日文和佛教课程，而不是单纯的佛经。

（一）从燕大到清华：周一良的跳槽经历

周一良本是燕大多年培养的后备师资，司徒雷登也很期待周一良毕业归国任教。然而，周一良到燕大任教不到半年，就有了离开之意。周一良多年后的回忆录中，提到了不满副教授职称和较差的住房待遇这两个原因。

或许此事还与他没有直接指出来当时的学校人事矛盾有关。周一良是洪煨莲选派赴美的，身上不免有洪派的标签。1946年1月28日，在邓之诚家，“午，洪煨莲来，言即将赴美国哈佛大学讲学，以半年为期，俟在重庆取得出国护照，即将乘飞机前往”。4月19日，邓之诚“知洪煨莲于十六日飞沪赴美”^③。1947年2月23日，邓之诚“得王钟翰上月三十日书，言洪煨莲已于三十一日赴旧金山，乘飞机往檀岛讲学，五月底毕。哈佛决定再聘一年，煨莲未定，其妻则甚愿留美云云。我

① 《美大学研究汉文 东西部重点不同 周一良在燕大演讲》，《燕京新闻》1946年12月23日第四版。

② 《艺文往来》，《大公报》（天津版）1947年2月8日第六版“大公园地”。

③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册，第348、373页。

固知其不肯归也”。4月6日，“聂崇岐（言得洪煨莲信，今年不归矣）、陈洪舜、冯家昇来”。4月8日，在邓之诚家，“齐思和来言，渠得洪煨莲信，言‘今年不归，以燕校败坏至此，如归恐更不好处。唯盼予及史系同人坚忍云云’。又言昨此间校务会议陆志韦宣布下年辞退教员已发通知，未得通知者一律留任。晚，周一良来，久谈”。一直到1948年10月1日，“齐思和来，言聂崇岐有信，洪煨莲归兴不浓，将先后往华盛顿、纽约及旧金山等处作巡回讲演”^①。洪煨莲本人当时滞美未归，自然无法给周一良提供护佑。燕大的人事聘任基本由陆志韦主导，周一良不太容易得到太多的照顾，反而有被辞退的风险。周一良1947年4月8日当晚与邓之诚所谈，或许就与辞退教师、改投清华一事有关。

清华大学方面早就有引进周一良的意愿。1947年2月，外国语文学系主任陈福田教授致函梅贻琦校长，内容如下：

月涵校长钧鉴：前年在昆明时曾与冯院长谈到聘请周一良先生为敝系与历史系合聘教授，担任日文及历史课程。复校后，亦已与雷院长商量过此事。惟因历史系已有王信忠先生担任日本历史等课程，历史系又因有名额之限止，不能合聘周先生。而敝系日文课程今年勉强请到关世雄先生担任，关先生教书虽努力，但无论如何比不上周先生，故拟先请示聘任委员会可否进行聘请周一良先生为敝系副教授（或教授），月薪多少，以便打听渠能到清华服务否（此事尚未与周先生谈过，而尚未与见面过）。

周一良先生毕业燕京大学，后在哈佛大学续得硕士与博士学位（民国三十三年夏）。三十三年到三十五年，在哈佛当教员，担任日文课程。三十五年秋季返燕京，担任日文及佛教课程（在燕京为副教授）。周先生博士论文是与佛教经书有关系，故对于梵文亦

^①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册，第414、420、421、460页。

有研究与兴趣。现每星期到陈寅恪先生家旁听功课，渠是有造就的青年学者。敝系深望能聘为教师。专此，顺颂
钧安！

陈福田 谨上 二月七日

清华大学档案馆现存此信函（二纸）首页，夹杂有三处学院与校方的批示文字：“本年有关先生授日文课，如系中尚有余额，似亦即下学年起聘为宜。海宗，八日。”“待下次定 二、十一。”“聘为外语系教授，460元，下学年。”^①

2月25日，代理文学院长雷海宗教授就此聘任事宜致函校方：

关于上次聘任委员会外语系未决各案查询结果如下：

（一）周一良先生，据陈寅恪先生言，造诣甚高，现在他校待遇，因有特殊情形，不足为据，如下年聘请，可予以教授名义，待遇照例。……

此函中的梅校长批示：“卅六年教授，460元。琦。三、七。”^②1947年3月17日，叶企孙代发的公文：“周一良、何高克正、李广田、钱三强诸先生之聘书，可即根据三月七日聘任委员会之记录缮发。”同一天清华大学秘书长（暂代）陈岱孙的批复：“秘书处发聘书，通知出纳组。”^③

1947年4月，梅贻琦《复员后之清华（续）》一文中介绍外国语文

① 《致函梅贻琦：可否聘请周一良为敝系副教授或教授》，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档案编号1-4：2-102；1-027。

② 《聘任委员会关于外语系周一良、梅香兰、何高克正的决案结果》，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档案编号1-4：2-102；1-028，页号57。孟繁之最早注意到此两份档案。参见孟繁之《读〈周一良读书题记〉》，分载《东方早报》2013年3月10日、3月17日“上海书评”。

③ 《周一良、何高克正、李广田、钱三强诸先生之聘书可即根据聘任委员会之记录缮发》，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档案编号1-4：2-103；2-039，页号73。

学系的情况，提及“现时本系对下学年计划已开始进行，旧教授中决定返校者有吴宓及胡毅两位教授，应聘下学年来校任教者有莫泮芹及周一良两位教授”^①。

在邓之诚的日记中，偶尔可见两人的往来。1947年6月29日，“晚，周一良来”^②。9月30日，“午，周一良来”^③。而在1947年8月，周一良正式离开燕京大学，改聘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

不过，1947年9月18日，《华北日报》刊登了《燕大本年教授阵容》，其中国文系的师资有：

[本报讯] 燕京大学本年度教授阵容，至为强硬，均系罗聘国内外专家。兹将各院系教授名单志次：

文学院：院长梅贻宝。（1）国文系：主任教授高名凯，教授梁启雄、林庚、朱自清（兼任）、陈梦家（兼任），副教授（周一良）^④。

从此则报道来看，燕大仍然是以副教授名义来聘请周一良，但他下决心去了清华大学。1947年9月26日，朱自清“访周一良、陈寅恪”，次日他又收到一良的来信。^⑤说明周一良已经正式到清华工作了。11月15日，朱自清又收到周一良的来信。^⑥

1947年11月，周一良填写了一份履历表（见表二），具体内容如下：

① 梅贻琦：《复员后之清华（续）》，《清华校友通讯》复员后第二期，1947年4月25日。此据《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四卷，第38页。

②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册，第430页。

③ 同上书，第438页。

④ 《燕大本年教授阵容》，《华北日报》1947年9月18日第五版。

⑤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日记下”，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72—473页。

⑥ 同上书，第480页。

表二 清华大学教员资格审查履历表（三十六年二月修正）

姓名		别号	性别	籍贯	生年	
周一良			男	安徽省至德县	民国纪元后 二年一月	
现任职务	职别	服务院系	到职时期	擅长科目		
	教授	文学院外语系	卅六年八月	东方语言（日本文、梵文） 中国历史（六朝隋唐时代）		
学历	学校名称		院系科	毕业年月	领受学位年月	呈制证件类别（件数）
	燕京大学		文学院历史系	廿四年六月	廿四年六月	毕业证书已于南京陷落时散失
	美国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东方语文系	卅三年六月	卅三年六月	博士证书（壹）
经历	服务机关		职别	任职年月	卸职年月	呈缴证件类别（件数）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廿五年八月	廿六年七月	
	美国哈佛大学		Teaching fellow	卅二年九月	卅三年八月	
	同上		Instructor	卅三年九月	卅五年八月	
	燕京大学		副教授	卅五年九月	卅六年八月	证明书（壹）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专任研究员	在假	年 月	
	北京大学		兼任讲师	卅六年九月	年 月	聘书（壹）
	故宫博物院		专门委员	卅五年十二月	年 月	

续表

随缴著作	名称		出版处所	名称	出版处所
	魏收之史学		燕京大学 燕京学报社	能仁与仁祠	燕京大学 燕京学报社
	Tantrism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	Notes on Marvasi's Account o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
粘 贴 像 片	请予审查等级	填表年月	通讯处		
			永久	现在	
	教授	卅六年十一月	天津第十区桂林路廿号	北平清华大学胜因院廿二号	
备注	其他著作散见于《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燕京学报》、《史学年报》、《图书季刊》、《大公报》文史周刊、图书周刊等				

从此表中可见，周一良到清华入职的时间是1947年8月。在学术方面，周一良对自己的梵文水平是相当看重的，将其列为擅长科目之一。

1948年3月30日，朱自清“与芝生共商系计划。”^①1948年9月23日，《华北日报》刊登《清华教授阵容及本学期所授课程》，其中文学院哲学系有“师觉月（早期印度哲学）”，历史系有“周一良（亚洲诸国史）”^②。周一良“我在清华中文系开‘佛典翻译文学’课，系主任朱佩弦（自清）先生事后告诉我，他问过陈先生我行不行，陈先生表示赞成，朱先生才同意的”^③。

周一良在清华任教期间，也到燕大和北大兼课。1948年2月7日，邓之诚的日记记载：“下午，齐思和来，久谈，言周一良只允兼课，

①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日记下”，第500页。

② 《清华教授阵容及本学期所授课程》，《华北日报》1948年9月23日第五版。

③ 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毕竟是书生》，第130—149页。

不允专任，可谓固执。”^①很显然周一良不愿再重归燕大。燕京大学编《燕京大学教职员名录》中的历史系师资名单有：“周一良 Chou Yi-Liang, Ph.D., Professor (Part-time) 兼任教授”。^②6月19日，“傍晚，周一良来，以影印本《名家诗永》为赠”。此《名家诗永》影印本应该是1936年至德周氏借官田徐氏藏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砌玉轩刻本影印的王尔纲评选本。这仍然相当于周一良拿本家的产品赠送给邓之诚。11月7日晨，邓之诚“偕钟翰赴清华访周一良，不晤”。11月10日，“周一良来”。1948年12月，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筹备委员会编《国立北京大学历届校友录》居然将周一良收录其中：

周一良 安徽至德 史学系兼任讲师 清华大学胜因院
22号^③

1949年8月1日前夕，周一良填写了一份应聘书，从清华大学外文系转而应聘历史学系。其内容如下：

应聘书

兹应

国立清华大学之聘为历史学系教授并愿履行后列聘约

（一）此项聘约以一年为期。（自民国三十八年八月一日起）（至民国三十九年七月卅一日止）期满若得双方同意再行续订。

（二）薪金每月国币 元。

（三）一切待遇照本大学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办理。

（签字盖章）周一良 （周一良印）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一日

①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册，第444页。

② 燕京大学编：《燕京大学教职员名录》（中英文本），燕京大学，1948年，第8页。

③ 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筹备委员会编：《国立北京大学历届校友录》，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第44页。

此“应聘书”左下方另有签收日期“三八、七、卅收”。^①周一良改任历史学系教授之后，按“清华大学规定教授要开三门课。周先生除在历史系开《日本史》外，还在外文系开《高级日文》，在中文系开《佛经翻译文学》”^②。这种开课安排充分体现了周一良的跨学科研究能力。

1949年8月15日的中午，邓之诚“设酒为司马笑夫妇饯行，邀高名凯及周一良夫妇同饮”^③。司马笑是就读燕京大学的美籍留学生。1950年7月15日，邓之诚日记云：“齐思和来言：已商订周一良兼课之约。”^④1951年9月18日，清华大学公函致燕京大学，仍同意陈梦家等教授在燕京大学兼课。这说明两校教授相互兼课的情况一直保持着。

（二）周一良回国前后与梵文相关的学术研究

周一良在哈佛修习了梵文，除用于博士论文的写作之外，他还用于佛教史、敦煌研究等相关的论题。从语文学的角度来说，周一良对之有一定的兴趣，他掌握了语文学的基本方法，也能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但他从未从事过梵文写本校勘或梵汉文献对勘之类的工作。周一良利用自己的梵文知识，有效地深化了佛教史、佛教文献等相关问题的讨论。就此而言，这是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传统文史研究者所无法从事的工作。

在归国之前，周一良刊发了《中国的梵文研究》一文。^⑤该文首先介绍了印度梵文的简况，主要梳理了历代佛经翻译过程中汉地僧人关于梵文的著作（如悉昙、《天竺字源》、字书、佛经音义、《梵语千字文》、《梵语杂名》、《翻译名义大集》等）、梵文在汉语中留下的痕迹、

① 《周一良聘书》，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档案编号2-259-49002-105。

② 齐世荣：《记20世纪40年代末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几位外国史教授》，《历史教学问题》2015年第1期，第60—64页。

③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册，第454、461、462、479页。

④ 同上书，第524页。

⑤ 周一良：《中国的梵文研究》，《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5期，1944年，第10—19页。

译经文体中的梵文语法现象。可以说,该文是国内学者第一篇关于中国梵文的小史,指出了历代的相关文献和语料,具有宏观的指导意义。该文所涉及的内容,季羨林也很有兴趣,他发表的短文《从中印文化关系谈到中国梵文的研究》从文化关系史的角度进行了简要的论述。^①其内容的丰富性实不如周一良的《中国的梵文研究》。周文的价值也得到了后辈从事佛教语言研究学者的认可,被收录于《佛教汉语研究》一书中。^②

1947年6月,周一良的《能仁与仁祠》充分考虑了巴利文《长部》(*Dīgha Nikāya*)中的语料,来考证“能仁”中的“能”字的原意,还利用了佛教《法句经》(*Dharmapada*)、马鸣(*Aśvaghoṣa*)的梵文长诗《美难陀传》(*Saundarananda*)中的例句,从而阐明了“能仁”与“仁祠”得名的由来。^③

周一良《论佛典翻译文学》从纯文学、通俗文学、语言史三个角度,阐发汉译佛经的文学价值。周一良利用梵文、巴利文佛教原典来考证对应的汉译文本中的词汇(或段落)意义。他引证了梵本《佛所行赞》(*Buddhacarita*)中的śīrasypaghrāya(“原指印度一种连嗅带吻的礼节”),来确认汉译本《佛所行赞》卷一“王见太子至,摩头瞻颜色”中的“摩头”的含义。《佛所行赞》的不同版本中,存在“生亡我所钦”与“共我意中人”的异文,周一良指出梵本中相应的Gataḥ kva sa chandaka manmanorathaḥ与后者意义更吻合,从而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异文确认问题。周一良还发现了与梵本民间故事集《五卷书》(*Pañcatantra*)相对应的汉译佛经中的寓言故事等。此外,周一良还指出了《义足经》的巴利文名称Arthapada、梵文Punarapi(复次)的含义。^④

① 季羨林:《从中印文化关系谈到中国梵文的研究》,《国防新报》1948年革新第1期,第8—9页。

② 朱庆之编:《佛教汉语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66—481页。

③ 周一良:《能仁与仁祠》,《燕京学报》第32期,1947年,第152—161、272页。

④ 周一良:《论佛典翻译文学》,《申报·文史副刊》第三一五期,1947年。

1948年4月,周一良刊发的《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一文,有梵本《佛所行赞》(*Buddhacarita*)作为讨论的知识背景,虽未直接引用梵本中的偈颂,但讨论了该诗作的名称。^①

1948年,周一良的《跋敦煌写本〈法句经〉及〈法句譬喻经〉残卷三种》利用敦煌写本数据,与多语种的《法句经》写本的内容相比勘,以论述汉译本诸版本中的异文之正误。该文不仅提及藏译《优陀那品》(*Udānavarga*,《法句经》之一种),还利用了巴利文《法句经》的偈颂及其英译文本进行对勘。此文也引用了“友人季羨林先生据巴利文 *Vinaya* I.7”的考证以及“季君比照上引诸文”所得出的结论。周一良在季羨林的论证基础上,引用巴利文和藏文的数据,推断写本中的“弃故”比“弃欲”更符合原典涵义。^②

1949年6月刊印的《〈牟子理惑论〉时代考》中,周一良引用了“梵文俗语混淆的小乘佛传”《大事》(*Mahāvastu*)、“较晚的梵文大乘佛传”《神通游戏经》(*Lalitavistara*,对应汉译《普曜经》)、梵藏汉《佛所行赞》、巴利文本生经 *Nidānakathā* 中有关白象下生等资料,来确定《牟子理惑论》所引证资料的年代。本文所涉及的资料语种(梵巴藏汉)较多,说明周一良对多语种的佛教文献较为熟悉。^③

周一良在与梵文相关的研究方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比较关注重点文化词汇的梵汉源流,比如,他参与讨论唐代变文与俗讲时,在《关于唐代俗讲再说几句话》一文中,特别指出“变文”的“变”是梵语 *citra* (画)的对译。这一观点多年后得到日本学者辛嶋静志的认可和进一步的阐发。^④

① 周一良:《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申报》1948年4月17日“文史副刊”第19期。

② 周一良:《跋敦煌写本〈法句经〉及〈法句譬喻经〉残卷三种》,《图书季刊》1947年新8卷第1—2期,第22—24页。

③ 周一良:《〈牟子理惑论〉时代考》,《燕京学报》第36期,1949年,第2—24、341页。

④ [日]辛嶋静志:《变、变相及变文之义》,裘云青译,方一新主编:《汉语史学报》第22辑,2020年,第259—275页。

三、新见周一良信札及其与季羨林的学谊

周一良归国之前，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燕京大学等单位都有意聘任他，但他按照事先的约定，重回燕京，执教中文系。由于学术兴趣的部分相近，再加上都是陈寅恪的崇拜者，周一良与季羨林不可避免地在北平相遇和相交。

1946年11月27日，《大公报》（香港版）第三版“文史周刊·图书周刊”刊发短讯《北平图书馆增设研究室 聘定学者多人分任会务》：

[本报北平电话]北平图书馆为便利研究起见，近又增设国际问题研究室、舆图研究室及金石拓片研究室，均于十二月一日正式开放。闻该馆近聘学者多人分任馆务，已发表者有秘书主任兼总务主任吴光清（芝加哥大学图书学博士，不久返国），西文秘书顾子刚，采访主任李芳馥，编目主任会宪三，善本主任赵万里，特藏主任于道泉，舆图主任王访渔，研究主任王重民，阅览主任莫于敏卿，日本研究室顾问张凤举，苏联研究室顾问叮邦福（俄国驻平学者），编纂委员会委员向达、陈梦家、周一良、孙楷第、季羨林、陈寅恪等。又该馆除继续出版《图书季刊》外，并与《大公报》商妥自下月起恢复“图书周刊”，报道学术消息，介绍中西新书。

周一良、季羨林、陈梦家能与陈寅恪、向达等名家一起被北平图书馆合聘为编辑委员会委员，说明袁同礼等北平学界前辈对这几位海归的青年才俊是很看重的。1947年1月11日，周一良与季羨林首次见面的第二天，他们就在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守和（同礼）请客时同桌，“八点前吃过早点，到研究室去，想抄论文，但替周一良查《大藏经》，没能抄成。十点到北楼去上周祖谟先生的课，十二点下课，同向达坐洋车

到北平图书馆。今天袁守和请客，同桌的有胡适之先生、陈援庵先生、向达、周一良、赵万里、邵循正、容肇祖”^①。

（一）日常的交往、学术讨论与讲座

季羨林归国日记中，多次记载了与周一良交往的情况。1947年3月14日晚，“谈到八点半回来，邓嗣禹同了周一良来，一直谈到快十一点才走，先在我屋里，后到邓屋里，最后又到王岷源屋里”。邓嗣禹是周一良在燕京大学时的学长，也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耶鲁毕业的王岷源曾到哈佛燕京学社《汉文大辞典》处工作，借住赵元任先生家。他们仨都有共同的留美经历，往来自然密切。3月20日晚，季羨林“七点多回来，屋里又冷起来。八点躺下，十点又起来，仍同周一良、邓嗣禹、王岷源闲话。十点半睡”。3月31日下午，“两点到北楼去上课，一上两堂，人颇疲倦。回到图书馆，听说周一良来，赶忙回来，没遇到”^②。

4月19日，燕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上课如例。午赴哈佛燕京学社招饮，在陆志韦处。师宾月未到，到者梅福士、海格尔、杜传诗及翁（独健）、齐（思和）、聂（崇岐）、周诸人，申初散。”^③经核查邓氏日记稿本，此处确实写作“师宾月”，但笔者怀疑此人应为英印政府选派来北大担任客座教授的师觉月（P. C. Bagchi），邓之诚将此人排在梅福士、海格尔等外国学者之前，说明其人也是一位外国学者。如果他确实是师觉月，那么其未到的原因就是当天下午在北大有演讲。另，此处的“周”应该是指从哈佛归来的周一良。

4月24日下午，“到对面小馆吃过晚饭，到研究室拿了本书，在操场里遇到周一良同邓嗣禹。站住谈了半天，回来看报，看 Kielhorn”。5月5日晚，“周一良来，谈了好久才走”。5月7日，早上“就到图书馆去，先写给周一良一封长信”。目前未能找到有关该长信的资料。5月

① 季羨林：《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羨林归国日记（1946—1947）》，第144页。

② 同上书，第177、180、186页。

③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上册，第422—423页。

21日晚上,“五点半出去吃过晚饭,回来阴法鲁来,他刚走,长之来,九点周一良来。同周一良、王岷源谈到十点多”^①。

周一良当时常去陈寅恪先生家,读报给他听。周、季两人偶尔在陈家会面。6月10日上午,“八点多出去,路上遇到豫图,到骑河楼上车到清华去。下了车先去看邵循正,同他一同到陈寅恪师家把书价议定。在那里遇到周一良。一同吃过午饭,同周一良步行到燕京,雇三轮一直回到北大”。6月29日上午,季羨林“八点半出去到骑河楼上汽汽车到清华去,下了车就去看陈寅恪先生。谈了几个问题,浮屠与佛的问题也谈过了。不久周一良去了,我们就没再谈下去”^②。

6月14日下午,在北大教学楼,“三点Bagchi同汤先生去,周一良也去了。三点Bagchi演讲,四点多讲完,我送他回家,回来看了会书,外面一阵暴风雨”^③。周一良此次可能去听了师觉月的演讲,其题目为《贵霜王朝的政治与文化》。周一良在1944年的论文《中国的梵文研究》中,就引述了“印度学者P. C. Bagchi”对《梵语千字文》的研究,特别是列举了师觉月判定《梵语千字文》的作者为唐代求法高僧义净的几条证据。^④这说明周一良早前已经关注到师觉月的研究成果。

6月19日下午,“十点前周一良来,谈到十点半走”。好几次他们都是晚上会面畅谈,可见关系较为密切。6月27日晚,“七点同秦瓚、王岷源、庄孝德到正昌菜馆去,我们替邓嗣禹饯行。苗仲华、周一良等已经在那里等我们。吃完九点多回来,周一良同来,谈到十一点走。外面大风”。7月1日下午,“四点回来,到邓嗣禹屋里去,翁独健在那里,周一良不久也去了。一直谈到五点半,出去吃过晚饭,回来看报,看《胡适论学近集》。周一良来,同到王岷源屋去谈了会,又同去邓嗣禹屋,十一点回来”。10月1日,下午“周一良去谈了谈,吃过晚饭,

① 季羨林:《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羨林归国日记(1946—1947)》,第197、203、212页。

② 同上书,第221、231页。

③ 同上书,第223页。

④ 周一良:《中国的梵文研究》,《思想与时代》第35期,1944年,第10—19页。

回来，看周一良的《能仁与仁祠》”^①。这是周一良将最新在《燕京学报》刊发的论文送给了季羨林。

1947年上学期，周一良、季羨林、邓嗣禹、王岷源、翁独健、师觉月等人有多次的聚谈。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学术活动是季羨林邀请周一良到北大东方语文学系作学术演讲。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自1946年8月成立之后，虽师生人数稀少，又加上时局艰难，但季羨林还是想方设法组织了一些学术活动，增加该系的活力与人气，以壮本系的声色。除师觉月教授做了有关印度古代历史文化的系列演讲之外，季羨林还规划了东方语文学系学术公开演讲系列，邀请年高名师或者海归中青年才俊举行讲座。5月8日下午，东方语文学系学术公开演讲首场的主讲人是北京大学文学学院院长汤用彤教授。汤先生是推动成立东方语文学系的中坚之一，出力甚多，他自然会大力支持该系的学术活动。季羨林的日记中记载了当天首次演讲的情形：“两点半回到北楼，找到汤先生。三点是东方语文学系学术公开演讲的第一讲，主讲人就是汤先生，题目是《佛典翻译》。五点才完。同汤先生谈了谈。”

学术公开演讲的第二讲主讲人就是时任燕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周一良。5月29日，季羨林“十一点下去同汤先生谈了谈买书的问题，回去让王先生写了几张布告”^②。5月30日，季羨林“十点下课，到办公室去看王森写了个布告”^③。当天下午是东方语文学系邀请燕京大学周一良来讲座，王森所写的就是讲座的海报。下午的讲座情况是：

三点半周一良来，我们一同到北楼去。今天是东方语文学系的第二次公开学术演讲，周主讲，题目是《佛教翻译文学》。听的人不太多，汤先生也去了，讲完在休息室坐了会。周、汤先生、王岷源一同回到我屋里，谈了半天闲话，一同出去吃饭。我同王

① 季羨林：《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羨林归国日记（1946—1947）》，第226、230、232、273页。

② 同上书，第215页。

③ 同上。

请客。吃完到秦先生屋里去闲谈，十点周去[走]，我也就回来。^①

周一良演讲的题目《佛教翻译文学》，不仅与他在哈佛读博期间所学有关，也和他在燕京大学所开的课程“佛教翻译文学”有关，属于东方学的范畴。他的这次演讲可能就是讲述了在《申报·文史副刊》发表的论文《论佛典翻译文学》。

10月13日，北大草拟了给周一良的聘书，为“三十六年十月廿四日发”，其内容为：

国立北京大学聘书 卅六年京字第七七一号

敬聘

周一良先生为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兼任讲师

此订

校长^②

该聘书底稿右侧另有“闻已上课，故先拟聘。正文 十、十三。”周一良的这份兼职讲师聘书也是郑天挺签发的。同时，根据北大1947—1948学年第二学期的课表，周一良当时在北大文学院历史系兼职授课，所讲授的也是《佛典文学》课^③，他所讲的内容均属于东方学研究的范畴。

周、季二人互相阅读论文。季羨林除看周一良的《能仁与仁祠》之外，10月4日，他还撰写和抄定《关于仁祠》一短文，该文似乎未发表，但从题目来看，或许是对周文的补说。1947年11月20日，周一良也致函季羨林，讨论对方的论文《浮屠与佛》。该函内容如下：

① 季羨林：《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羨林归国日记（1946—1947）》，第216页。

② 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案编号BD1948180页码076。

③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各系课程一览》（1947年12月），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案编号BD1947502，页码026。

羨林我兄左右：尊著拜读，至佩至佩，唯谈pud之佛字，皆是仿佛二字连文之连绵字，或是一种progressive assimilation耶。一良与寅恪先生谈及大作，皆于《四十二章经》之真伪颇为怀疑，唯兹事体大，尚须详考耳。尊作所引回纥文似以作回纥二字为宜，因畏兀字样太晚，易滋误会也。至回纥文之tngri tngri (?)云云，盖即《史记》诸书所载匈奴谓天为撑犁，亦即devātideva或天中天矣。拙作取回奉上，一次不能刊完或须分两次。若能为之再觅一处刊载，亦悉随尊便可耳。余容面罄。顺颂

著安！

弟 一良 顿首 十一月廿日

季羨林的《浮屠与佛》起源于当年6月29日同陈寅恪先生的讨论。7月2日晚，季羨林开始“思索怎样写《浮屠与佛》”。7月4日下午，季羨林开始动笔写《浮屠与佛》。7月5日、6日、12日、14日，陆陆续续写作此文。暑假期间，季羨林因为回山东老家探亲，暂停写作。直到9月初回到北平，从9月5日到14日，季羨林才完成初稿的撰写、修改和抄写。9月18日，季羨林到清华“去看陈寅恪先生，把《浮屠与佛》念给他听了一遍。”此后，季羨林又陆续同李荣、周祖谟等汉语史家讨论《浮屠与佛》中的音韵问题，并补充、改写，甚至重写和改作其中的段落。直到1947年10月9日，季羨林才完成此文定稿。该文蒙陈寅恪推荐，1948年正式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上册，第93—105页）。此信中，周一良与陈寅恪先生讨论《浮屠与佛》中涉及的《四十二章经》真伪、佛字之发音、梵语devātideva（天中天）等问题，很显然是在该论文正式发表之前。他所提出的观点有可能被季羨林吸收，放进论文之中。此外，周一良所提及的“拙作”，具体所指待考。

1947年秋，周一良因为职称和住房待遇等问题离开燕京大学，改聘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但他同时在燕京或北大兼课。1948年2月

7日，邓之诚的日记记载：“下午，齐思和来，久谈，言周一良只允兼课，不允专任，可谓固执。”^①5月31日下午五时，北大行政会议第六十二次会议在子民纪念堂举行，此次会议的决议事项中，“十九、补充聘任事项：东方语文系聘金克木先生为教授，史学系聘周一良先生为教授。”^②当时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的周一良并未接受北大的聘约，而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才来北大任教。

季羨林《浮屠与佛》一文正式发表之后，1948年7月26日，周一良再次致函季羨林，索要论文抽印本以及托请代查两条史料。该函内容如下：

羨林我兄：

大著《浮屠与佛》能赐一册否？礼拜日当来面领。

久不见，近况如何？我回津一月，车断被阻。住了一礼拜。回清华又要看入学卷子。暑假已过其半，竟不能有所成就，可叹。

为学会会报补白计，想把久久挂怀的《牟子理惑论》重新“理”一下“惑”。希望在开学前能草一小文塞责。现在想麻烦你两件事。（一）尊处有Lefmann之*Lalitavistara*，请代查如来降生一段，摩耶夫人梦中所见，是佛化为“白象”，这是“六牙白象”。希望能将上下有关数语录出，并注页数。礼拜日下午当于见面时拜谢！（二）巴利Jataka I之Nidānakātha记此节云：Bodhisatta setavar varane ketva。如尊处有PTS刊本，乞代查此数语是在P.50抑P.51？

琐琐奉读，容面谢。即祝

夏安！

弟 一良 上 七月廿六日

①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册，第444页。

②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第62页。

《浮屠与佛》一文刊发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上册），更巧的是周一良的论文《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刚好在同期季文的前面（第75—92页）。周一良写此信时，尚未收到此期刊物，或许是急于再读季文的正式刊发稿，才提出此要求。周一良是在次月中旬收到此刊，据《周一良读书题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上册），三十七年八月十五日从南京寄到，一良。”

周一良当时拟开展对《牟子理惑论》的研究，一方面，他托请季羡林查找梵文佛传《普曜经》（*Lalitavistara*，《神通游戏经》）中有关六牙白象入胎的段落，以及英国巴利圣典学会（PTS，=Pali Text Society）整理刊印的巴利文《佛本生经》（*Jātaka*）第一册中的故事。《〈牟子理惑论〉时代考》一文的小注有“季羡林先生说当作 *svapnam*，是也”，说明两人就此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另一方面，他还向胡适、周祖谟等人请教。胡适看了此文初稿后，1948年8月7日，他给周一良写了一封长信，“八月五日的信与《理惑论时代考》都读过了。……尊论《牟子理惑论》的时代，我很感兴趣。但我不能赞同你的结论，其理由有二”。该信在落款之后，胡适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话：“今天赵凤喈先生来，我托他把我的长文带给你了。那时此信还没有写好。适之。”^①《〈牟子理惑论〉时代考》的成文时间为“卅七（一九四八），八，七夜初稿；八，廿七夜改稿”。1948年底在《燕京学报》第36期上正式发表。该文还有两个附录，分别为《周祖谟先生讨论函》和《胡适先生讨论函》。

有关周一良《牟子理惑论》的研究情况，1948年他在《牟子丛残》一书上所写的题记，提供了如下的线索：

① 季羡林主编，耿云志、欧阳哲生整理：《胡适全集》第25卷“书信”（1944—1955），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50—355页。该信另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9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203—217页。

《牟子丛残》

二十年二月叔迦叔给我，一良记于北平二眼井。

十七年前受此书于叔迦叔时未究心释氏之学，不遑细读也。近年稍稍涉猎内典，于此书颇致疑惑，终以序文史实之确切莫能解释。今日复取阅一过，恍惚若有所悟，亦不敢自信耳必是也。当年展社四人，志辅叔避地沪渎，柯燕舲遁迹津沽，叔迦叔留在旧京，而先四叔则墓木已拱矣。回忆二眼井时宛如目前，而旧游皆星散，掩卷惘然。时三十七年七月十六日灯下炎热识于清华园。

予撰《理惑论时代考》，既系汤锡予先生见告朝鲜有单行本《牟子》，与弘明本颇有异同，而遍觅不得。一九五零年六月，获见神尾弋春氏《东方文化杂考》中《朝鲜本〈牟子仁就□〉》一文，始知即神尾氏藏本影印行世者也。书题《道家论辩牟子理惑论》，不著撰人，亦不载序文，第一叶栏外右下方有“曹亿真雨主”五字，卷尾□白有“大施主御侮将军田连宗”十字，止有廿一篇。据神尾氏考订其删节约起高丽文宗（一零四七—一零八二），以后其刊印多□李朝世祖时（一四五六—一四六八）。书板犹存忠□南燕瑞山之开心寺。云此本与予所推论殊无关系，然文字颇有异同，尚存旧注，因备记于书眉。六月廿六日。一良记。

（编按：此书为展社丛书第一集第一种，公记印书局代印。二十年是1931年，书中大量眉批，且夹有周祖谟信一封。□处为字迹难以辨认。）^①

多年之后，《牟子丛残新编》刊行，增加了不少新内容。^②

（二）共同组建中国东方语文学会

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东方学研究的深化，1948年2月29日，季羨林、邵循正、马坚、周一良、翁独健、高名凯、王森等一批新锐的东

① 周启锐编：《周一良读书题记》，赵和平主编：《周一良全集》第九册，第420页。

② 周叔迦撰，周绍良新编：《牟子丛残新编》，北京：中国书店，2001年。

方学者，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举行了中国东方语文学会的成立大会。翁独健、季羨林、周一良、邵循正、马坚被选为理事，其中季羨林为理事主席，周一良兼任文书，马坚兼任总务。虽然由于当时华北时局的影响，战云笼罩，但该学会还是做了不少的工作，包括组织学术讨论会、联系国外的东方学研究机构、拟出版学术刊物、推动成立上海分会等。笔者曾刊《中国东方语文学会旧史钩沉》一文，对此学会的情况有所梳理^①，此不赘述。

周一良在学会中可能主要负责安排学术讨论会，联系北平城内的相关学者，以及拟编辑学会刊物等工作。1948年9月19日，周一良在致季羨林函中，涉及学会的相关工作，内容如下：

羨林我兄：

十月三日为第三次讨论会，由翁独健、韩镜清君主讲。望兄与马子实兄分别再知会城中诸兄，燕清两校由弟负责。恐时日已久，或已忘却原定日程也。韩君处弟拟再去一信，渠若不能来，恐须设法另觅替身，或由弟讲牟子问题，预偿此债，如何？会报稿件已收若干篇？

闻贵校聘今西春秋授日文，据云此人昔日态度至为傲慢，目前当亦如福克司等一变作风矣。弟原意愿为清华觅一日本人，与之合作讲授。将来有机会颇愿与今西一晤，看他有无合适人选，唯今年已太晚耳。

城外两校皆已开课，甚忙碌。拙作已从汤先生处取回否？汤公高见如何？便中乞掷下，以便改定。不一，
即祝，安好！

弟 一良 顿首

九月十九日

^① 陈明：《中国东方语文学会旧史钩沉》，《中国文化》2022年春季号（第五十五期），第173—189页。

从周一良的安排来看，学会的第三次讨论活动的主讲是翁独健和韩镜清，但在10月3日的聚会中，韩镜清因故未能主讲，而由周一良宣读了他新撰的《〈牟子理惑论〉时代考》一文。周一良此函中提及的日本学者今西春秋（1907—1979），是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的毕业生，曾师从内藤湖南、羽田亨等学者，主要从事满文文献研究。今西春秋于1938年来华，1940—1945年在北平执教，自然是“昔日态度至为傲慢”。在二战结束之后，他和德国学者福克司（Walter Fuchs，1902—1979）属于战败国的国民，也就不得不“一变作风矣”。今西春秋当时被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聘为日文兼任讲师。《华北日报》1948年9月17日第五版《北大教授阵容及本学期所授课程（一）》记载：“东方语文学系：主任季羨林、教授金克木（梵文）、马坚（阿拉伯文）、翁独健（蒙文）、王森（藏文）、今西春秋（日文）、季羨林（印度佛教史）、师觉月（印度文化史）。”

周一良此函中所问“拙作已从汤先生处取回否”，是指他将《〈牟子理惑论〉时代考》一文也呈给当时从美国讲学归来的汤用彤先生请教，并托季羨林去取汤先生的审读意见。周一良1948年9月6日给胡适先生回函中提到的“我希望锡予先生读了拙作后，也能给我们他的宝贵的意见！”所指的是同一样事情。上引《牟子丛残》题记云：“汤锡予先生见告朝鲜有单行本《牟子》，与弘明本颇有异同，而遍觅不得。”这应是汤用彤先生向周一良提供了《牟子理惑论》的版本信息。

周、季二人不仅交换论文互相切磋，也就论文的发表进行商议。1948年10月9日，周一良致函季羨林，提到了自己的两篇论文。该函内容如下：

羨林我兄：

惠函敬悉。弟前寄《国学季刊》文为论敦煌写本题记者，如贵系单独出版纪念论文集，恐性质不太相合。另有《法句经跋》一篇，乃系寄《北平图书馆刊》，而年余未发出，似迄未出版或与东

方论文较近。兹一并奉上，请任择其一可也。不用者亦乞暂存尊处，当去取。不一，即请
著安！

弟 一良 顿首 十月九日

1947年12月8日，北大校务会议决议成立“本校五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要求“每学院至少出版学术论文一册”^①。1948年夏，北京大学文学院开始编辑《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单行本刊出的有瞿同祖《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第四种）、季羨林《论梵文t、ḍ的音译》（第五种）、王利器《经典释文考》（第八种）、阴法鲁《唐宋大曲之来源及其组织》（第十种）、魏建功《十韵汇编资料补并释》（第十五种）等。

周一良此函中所谓“如贵系单独出版纪念论文集”，指的就是《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系列，此系列由北大文学院主编，而不是东方语文学系单独出版。周一良的“论敦煌写本题记者”或许是指《跋隋开皇写本〈禅数杂事〉残卷》一文，而“《法句经跋》一篇”是指《跋敦煌写本〈法句经〉及〈法句譬喻经〉残卷三种》，该文不仅刊于《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还另刊于《图书季刊》（1947年新8卷第1—2期，第22—24页），而非《国学季刊》和《北平图书馆刊》。同期《图书季刊》也刊发了《跋隋开皇写本〈禅数杂事〉残卷》（第21—22页）^②。周一良1948年另在《燕京学报》第35期发表了《敦煌写本杂钞考》一文（第212—219、313页）。此函中的“东方论文”，应该与中国东方语文学会拟出的会刊有关，可惜由于时局的变化，该会刊的出版计划无奈化为泡影。

（三）有关周叔弢六十生纪念文集的约稿等

1950年，恰逢周叔弢的六十虚岁，他的三位儿子（长子周一良、

① 另见《庆祝五十周年北大编印论文集》，《东南日报》1948年1月27日第六版。

② 该文另载《新疆日报》1947年8月13日第四版。

次子周珏良、三子周良良）与两位外甥（收藏家孙师匡、孙师白兄弟）合作，广邀前辈与同好，拟汇编一部祝寿文集。6月22日，“周一良来”邓之诚家。此次应该就是来当面约稿的。7月22日，“俞敏、周一良来”。周一良此次可能是关于兼课和催稿而来。^①

1950年6月28日，顾廷龙的日记提及：“得太初、进之信。太初征稿，为乃翁叔弢丈六十生日编印《纪念集》。”7月9日，“发周一良、闻在宥、朱进之信”^②。周一良作为编者之一，向国内多位学者约稿，为纪念乃翁六十生日而汇编成册。此书共有29位作者提供了论文（或译文），如周一良所说：“此册作者阵容当时颇为难能可贵”，作者包括了陈寅恪、余嘉锡、丁声树、王重民、季羨林、马坚、谢国桢、顾颉刚、邓之诚、赵万里、钱锺书、金克木等人。

该书相关的约稿、撰稿、交稿、出版等的情况，见于多篇论文中的说明或部分作者的日记之中。谢国桢《汉代画像考》（上编）中提及：“庚寅六月为叔弢先生六秩生日，一良世仁兄拟为尊翁辑刊纪念论文集，索稿于余，乃将已成四章，重为厘定。然谬误实多，殊不惬意，其余诸章，尚待写定。……一九五〇年八月于天津南开大学东楼湖滨。”^③金克木（译）《三自性论》文末也注明：“周叔弢先生今年六十寿辰，我就把这一篇拙劣的译文当做我的菲薄的礼物。一九四八年三月译，一九五零年七月记。”^④

1950年8月14日，顾颉刚“抄改《司马谈作史考》。……归，为司马谈一文再集材”。8月15日，“重抄《司马谈作史考》，并改定，得二千五百言。写周一良信。……《司马谈作史考》一文，尚系去秋所草，一年以来颇有新得，昨今修改又易稿两次。虽是一短文，而谨严精湛，可置于《观堂集林》中而无愧。假使天与我读书时间，容我作此类文

①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册，第522、524页。

② 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第542、543页。

③ 周珏良等编：《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天津师古堂自印本，1951年，第394页。

④ 同上书，第421页。

百篇，则即使其他著作悉未有成，亦为传人矣。（此文为周叔弢六十周年纪念集作）^①。顾颉刚对此文还是很看重的，他回信周一良，就是交稿了。他的交稿速度是比较快的。

陈梦家《世本考略》中说：“今因叔弢先生六十寿辰征文，录此以就正焉。一九五〇年九月，北京陈府。”^②马坚《理学问答研究》中说：“《理学问答》是一个抄本，为周叔弢先生珍藏之一。北京解放前，叔弢先生要我把这个抄本研究一下。现在把我初步研究的结果写成这个报告，以纪念叔弢先生六秩大寿，我想这是一件合适的礼物。”该文乃“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四日于北大”^③。

张政烺《敦煌写本杂钞跋》成稿于“一九五〇·九·二八。北京东四十条三十九号”。该文后面另有一简短“附记”，为周一良“近读郑麟趾《高丽史》”的笔记，乃“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周一良记”^④。刘修业《吴承恩年谱》中说：“一九五一年六月刘修业记于北京寓舍”。^⑤这是该书中最晚完稿的论文。

季羨林应周一良之约，给《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贡献了一篇短文《记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梵文原本的发现》（第177—180页），此文完稿于“一九五零年国庆日”。季羨林利用1931年印度吉尔吉特地区出土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梵本，对照唐代高僧义净的译本，讨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即“关于原文语言的问题”和“关于义净译经技术的问题”。特别是后者，季先生即以《药事》卷十“𑖦𑖩𑖪𑖫𑖬𑖭𑖮𑖯𑖰𑖱𑖲𑖳𑖴𑖵𑖶𑖷𑖸𑖹𑖺𑖻𑖼𑖽𑖾𑗀𑖿𑗁𑗂𑗃𑗄𑗅𑗆𑗇𑗈𑗉𑗊𑗋𑗌𑗍𑗎𑗏𑗐𑗑𑗒𑗓𑗔𑗕𑗖𑗗𑗘𑗙𑗚𑗛𑗜𑗝𑗞𑗟𑗠𑗡𑗢𑗣𑗤𑗥𑗦𑗧𑗨𑗩𑗪𑗫𑗬𑗭𑗮𑗯𑗰𑗱𑗲𑗳𑗴𑗵𑗶𑗷𑗸𑗹𑗺𑗻𑗼𑗽𑗾𑗿𑘀𑘁𑘂𑘃𑘄𑘅𑘆𑘇𑘈𑘉𑘊𑘋𑘌𑘍𑘎𑘏𑘐𑘑𑘒𑘓𑘔𑘕𑘖𑘗𑘘𑘙𑘚𑘛𑘜𑘝𑘞𑘟𑘠𑘡𑘢𑘣𑘤𑘥𑘦𑘧𑘨𑘩𑘪𑘫𑘬𑘭𑘮𑘯𑘰𑘱𑘲𑘳𑘴𑘵𑘶𑘷𑘸𑘹𑘺𑘻𑘼𑘽𑘾𑘿𑙀𑙁𑙂𑙃𑙄𑙅𑙆𑙇𑙈𑙉𑙊𑙋𑙌𑙍𑙎𑙏𑙐𑙑𑙒𑙓𑙔𑙕𑙖𑙗𑙘𑙙𑙚𑙛𑙜𑙝𑙞𑙟𑙠𑙡𑙢𑙣𑙤𑙥𑙦𑙧𑙨𑙩𑙪𑙫𑙬𑙭𑙮𑙯𑙰𑙱𑙲𑙳𑙴𑙵𑙶𑙷𑙸𑙹𑙺𑙻𑙼𑙽𑙾𑙿𑚀𑚁𑚂𑚃𑚄𑚅𑚆𑚇𑚈𑚉𑚊𑚋𑚌𑚍𑚎𑚏𑚐𑚑𑚒𑚓𑚔𑚕𑚖𑚗𑚘𑚙𑚚𑚛𑚜𑚝𑚞𑚟𑚠𑚡𑚢𑚣𑚤𑚥𑚦𑚧𑚨𑚩𑚪𑚫𑚬𑚭𑚮𑚯𑚰𑚱𑚲𑚳𑚴𑚵𑚷𑚶𑚸𑚹𑚺𑚻𑚼𑚽𑚾𑚿𑛀𑛁𑛂𑛃𑛄𑛅𑛆𑛇𑛈𑛉𑛊𑛋𑛌𑛍𑛎𑛏𑛐𑛑𑛒𑛓𑛔𑛕𑛖𑛗𑛘𑛙𑛚𑛛𑛜𑛝𑛞𑛟𑛠𑛡𑛢𑛣𑛤𑛥𑛦𑛧𑛨𑛩𑛪𑛫𑛬𑛭𑛮𑛯𑛰𑛱𑛲𑛳𑛴𑛵𑛶𑛷𑛸𑛹𑛺𑛻𑛼𑛽𑛾𑛿𑜀𑜁𑜂𑜃𑜄𑜅𑜆𑜇𑜈𑜉𑜊𑜋𑜌𑜍𑜎𑜏𑜐𑜑𑜒𑜓𑜔𑜕𑜖𑜗𑜘𑜙𑜚𑜛𑜜𑜝𑜞𑜟𑜠𑜡𑜢𑜣𑜤𑜥𑜦𑜧𑜨𑜩𑜪𑜫𑜬𑜭𑜮𑜯𑜰𑜱𑜲𑜳𑜴𑜵𑜶𑜷𑜸𑜹𑜺𑜻𑜼𑜽𑜾𑜿𑝀𑝁𑝂𑝃𑝄𑝅𑝆𑝇𑝈𑝉𑝊𑝋𑝌𑝍𑝎𑝏𑝐𑝑𑝒𑝓𑝔𑝕𑝖𑝗𑝘𑝙𑝚𑝛𑝜𑝝𑝞𑝟𑝠𑝡𑝢𑝣𑝤𑝥𑝦𑝧𑝨𑝩𑝪𑝫𑝬𑝭𑝮𑝯𑝰𑝱𑝲𑝳𑝴𑝵𑝶𑝷𑝸𑝹𑝺𑝻𑝼𑝽𑝾𑝿𑞀𑞁𑞂𑞃𑞄𑞅𑞆𑞇𑞈𑞉𑞊𑞋𑞌𑞍𑞎𑞏𑞐𑞑𑞒𑞓𑞔𑞕𑞖𑞗𑞘𑞙𑞚𑞛𑞜𑞝𑞞𑞟𑞠𑞡𑞢𑞣𑞤𑞥𑞦𑞧𑞨𑞩𑞪𑞫𑞬𑞭𑞮𑞯𑞰𑞱𑞲𑞳𑞴𑞵𑞶𑞷𑞸𑞹𑞺𑞻𑞼𑞽𑞾𑞿𑟀𑟁𑟂𑟃𑟄𑟅𑟆𑟇𑟈𑟉𑟊𑟋𑟌𑟍𑟎𑟏𑟐𑟑𑟒𑟓𑟔𑟕𑟖𑟗𑟘𑟙𑟚𑟛𑟜𑟝𑟞𑟟𑟠𑟡𑟢𑟣𑟤𑟥𑟦𑟧𑟨𑟩𑟪𑟫𑟬𑟭𑟮𑟯𑟰𑟱𑟲𑟳𑟴𑟵𑟶𑟷𑟸𑟹𑟺𑟻𑟼𑟽𑟾𑟿𑠀𑠁𑠂𑠃𑠄𑠅𑠆𑠇𑠈𑠉𑠊𑠋𑠌𑠍𑠎𑠏𑠐𑠑𑠒𑠓𑠔𑠕𑠖𑠗𑠘𑠙𑠚𑠛𑠜𑠝𑠞𑠟𑠠𑠡𑠢𑠣𑠤𑠥𑠦𑠧𑠨𑠩𑠪𑠫𑠬𑠭𑠮𑠯𑠰𑠱𑠲𑠳𑠴𑠵𑠶𑠷𑠸𑠺𑠹𑠻𑠼𑠽𑠾𑠿𑡀𑡁𑡂𑡃𑡄𑡅𑡆𑡇𑡈𑡉𑡊𑡋𑡌𑡍𑡎𑡏𑡐𑡑𑡒𑡓𑡔𑡕𑡖𑡗𑡘𑡙𑡚𑡛𑡜𑡝𑡞𑡟𑡠𑡡𑡢𑡣𑡤𑡥𑡦𑡧𑡨𑡩𑡪𑡫𑡬𑡭𑡮𑡯𑡰𑡱𑡲𑡳𑡴𑡵𑡶𑡷𑡸𑡹𑡺𑡻𑡼𑡽𑡾𑡿𑢀𑢁𑢂𑢃𑢄𑢅𑢆𑢇𑢈𑢉𑢊𑢋𑢌𑢍𑢎𑢏𑢐𑢑𑢒𑢓𑢔𑢕𑢖𑢗𑢘𑢙𑢚𑢛𑢜𑢝𑢞𑢟𑢠𑢡𑢢𑢣𑢤𑢥𑢦𑢧𑢨𑢩𑢪𑢫𑢬𑢭𑢮𑢯𑢰𑢱𑢲𑢳𑢴𑢵𑢶𑢷𑢸𑢹𑢺𑢻𑢼𑢽𑢾𑢿𑣀𑣁𑣂𑣃𑣄𑣅𑣆𑣇𑣈𑣉𑣊𑣋𑣌𑣍𑣎𑣏𑣐𑣑𑣒𑣓𑣔𑣕𑣖𑣗𑣘𑣙𑣚𑣛𑣜𑣝𑣞𑣟𑣠𑣡𑣢𑣣𑣤𑣥𑣦𑣧𑣨𑣩𑣪𑣫𑣬𑣭𑣮𑣯𑣰𑣱𑣲𑣳𑣴𑣵𑣶𑣷𑣸𑣹𑣺𑣻𑣼𑣽𑣾𑣿𑤀𑤁𑤂𑤃𑤄𑤅𑤆𑤇𑤈𑤉𑤊𑤋𑤌𑤍𑤎𑤏𑤐𑤑𑤒𑤓𑤔𑤕𑤖𑤗𑤘𑤙𑤚𑤛𑤜𑤝𑤞𑤟𑤠𑤡𑤢𑤣𑤤𑤥𑤦𑤧𑤨𑤩𑤪𑤫𑤬𑤭𑤮𑤯𑤰𑤱𑤲𑤳𑤴𑤵𑤶𑤷𑤸𑤹𑤺𑤻𑤼𑤽𑤾𑤿𑥀𑥁𑥂𑥃𑥄𑥅𑥆𑥇𑥈𑥉𑥊𑥋𑥌𑥍𑥎𑥏𑥐𑥑𑥒𑥓𑥔𑥕𑥖𑥗𑥘𑥙𑥚𑥛𑥜𑥝𑥞𑥟𑥠𑥡𑥢𑥣𑥤𑥥𑥦𑥧𑥨𑥩𑥪𑥫𑥬𑥭𑥮𑥯𑥰𑥱𑥲𑥳𑥴𑥵𑥶𑥷𑥸𑥹𑥺𑥻𑥼𑥽𑥾𑥿𑦀𑦁𑦂𑦃𑦄𑦅𑦆𑦇𑦈𑦉𑦊𑦋𑦌𑦍𑦎𑦏𑦐𑦑𑦒𑦓𑦔𑦕𑦖𑦗𑦘𑦙𑦚𑦛𑦜𑦝𑦞𑦟𑦠𑦡𑦢𑦣𑦤𑦥𑦦𑦧𑦨𑦩𑦪𑦫𑦬𑦭𑦮𑦯𑦰𑦱𑦲𑦳𑦴𑦵𑦶𑦷𑦸𑦹𑦺𑦻𑦼𑦽𑦾𑦿𑧀𑧁𑧂𑧃𑧄𑧅𑧆𑧇𑧈𑧉𑧊𑧋𑧌𑧍𑧎𑧏𑧐𑧑𑧒𑧓𑧔𑧕𑧖𑧗𑧘𑧙𑧚𑧛𑧜𑧝𑧞𑧟𑧠𑧡𑧢𑧣𑧤𑧥𑧦𑧧𑧨𑧩𑧪𑧫𑧬𑧭𑧮𑧯𑧰𑧱𑧲𑧳𑧴𑧵𑧶𑧷𑧸𑧹𑧺𑧻𑧼𑧽𑧾𑧿𑨀𑨁𑨂𑨃𑨄𑨅𑨆𑨇𑨈𑨉𑨊𑨋𑨌𑨍𑨎𑨏𑨐𑨑𑨒𑨓𑨔𑨕𑨖𑨗𑨘𑨙𑨚𑨛𑨜𑨝𑨞𑨟𑨠𑨡𑨢𑨣𑨤𑨥𑨦𑨧𑨨𑨩𑨪𑨫𑨬𑨭𑨮𑨯𑨰𑨱𑨲𑨳𑨴𑨵𑨶𑨷𑨸𑨹𑨺𑨻𑨼𑨽𑨾𑨿𑩀𑩁𑩂𑩃𑩄𑩅𑩆𑩇𑩈𑩉𑩊𑩋𑩌𑩍𑩎𑩏𑩐𑩑𑩒𑩓𑩔𑩕𑩖𑩗𑩘𑩙𑩚𑩛𑩜𑩝𑩞𑩟𑩠𑩡𑩢𑩣𑩤𑩥𑩦𑩧𑩨𑩩𑩪𑩫𑩬𑩭𑩮𑩯𑩰𑩱𑩲𑩳𑩴𑩵𑩶𑩷𑩸𑩹𑩺𑩻𑩼𑩽𑩾𑩿𑪀𑪁𑪂𑪃𑪄𑪅𑪆𑪇𑪈𑪉𑪊𑪋𑪌𑪍𑪎𑪏𑪐𑪑𑪒𑪓𑪔𑪕𑪖𑪗𑪘𑪙𑪚𑪛𑪜𑪝𑪞𑪟𑪠𑪡𑪢𑪣𑪤𑪥𑪦𑪧𑪨𑪩𑪪𑪫𑪬𑪭𑪮𑪯𑪰𑪱𑪲𑪳𑪴𑪵𑪶𑪷𑪸𑪹𑪺𑪻𑪼𑪽𑪾𑪿𑫀𑫁𑫂𑫃𑫄𑫅𑫆𑫇𑫈𑫉𑫊𑫋𑫌𑫍𑫎𑫏𑫐𑫑𑫒𑫓𑫔𑫕𑫖𑫗𑫘𑫙𑫚𑫛𑫜𑫝𑫞𑫟𑫠𑫡𑫢𑫣𑫤𑫥𑫦𑫧𑫨𑫩𑫪𑫫𑫬𑫭𑫮𑫯𑫰𑫱𑫲𑫳𑫴𑫵𑫶𑫷𑫸𑫹𑫺𑫻𑫼𑫽𑫾𑫿𑬀𑬁𑬂𑬃𑬄𑬅𑬆𑬇𑬈𑬉𑬊𑬋𑬌𑬍𑬎𑬏𑬐𑬑𑬒𑬓𑬔𑬕𑬖𑬗𑬘𑬙𑬚𑬛𑬜𑬝𑬞𑬟𑬠𑬡𑬢𑬣𑬤𑬥𑬦𑬧𑬨𑬩𑬪𑬫𑬬𑬭𑬮𑬯𑬰𑬱𑬲𑬳𑬴𑬵𑬶𑬷𑬸𑬹𑬺𑬻𑬼𑬽𑬾𑬿𑭀𑭁𑭂𑭃𑭄𑭅𑭆𑭇𑭈𑭉𑭊𑭋𑭌𑭍𑭎𑭏𑭐𑭑𑭒𑭓𑭔𑭕𑭖𑭗𑭘𑭙𑭚𑭛𑭜𑭝𑭞𑭟𑭠𑭡𑭢𑭣𑭤𑭥𑭦𑭧𑭨𑭩𑭪𑭫𑭬𑭭𑭮𑭯𑭰𑭱𑭲𑭳𑭴𑭵𑭶𑭷𑭸𑭹𑭺𑭻𑭼𑭽𑭾𑭿𑮀𑮁𑮂𑮃𑮄𑮅𑮆𑮇𑮈𑮉𑮊𑮋𑮌𑮍𑮎𑮏𑮐𑮑𑮒𑮓𑮔𑮕𑮖𑮗𑮘𑮙𑮚𑮛𑮜𑮝𑮞𑮟𑮠𑮡𑮢𑮣𑮤𑮥𑮦𑮧𑮨𑮩𑮪𑮫𑮬𑮭𑮮𑮯𑮰𑮱𑮲𑮳𑮴𑮵𑮶𑮷𑮸𑮹𑮺𑮻𑮼𑮽𑮾𑮿𑯀𑯁𑯂𑯃𑯄𑯅𑯆𑯇𑯈𑯉𑯊𑯋𑯌𑯍𑯎𑯏𑯐𑯑𑯒𑯓𑯔𑯕𑯖𑯗𑯘𑯙𑯚𑯛𑯜𑯝𑯞𑯟𑯠𑯡𑯢𑯣𑯤𑯥𑯦𑯧𑯨𑯩𑯪𑯫𑯬𑯭𑯮𑯯𑯰𑯱𑯲𑯳𑯴𑯵𑯶𑯷𑯸𑯹𑯺𑯻𑯼𑯽𑯾𑯿𑰀𑰁𑰂𑰃𑰄𑰅𑰆𑰇𑰈𑰉𑰊𑰋𑰌𑰍𑰎𑰏𑰐𑰑𑰒𑰓𑰔𑰕𑰖𑰗𑰘𑰙𑰚𑰛𑰜𑰝𑰞𑰟𑰠𑰡𑰢𑰣𑰤𑰥𑰦𑰧𑰨𑰩𑰪𑰫𑰬𑰭𑰮𑰯𑰰𑰱𑰲𑰳𑰴𑰵𑰶𑰷𑰸𑰹𑰺𑰻𑰼𑰽𑰾𑰿𑱀𑱁𑱂𑱃𑱄𑱅𑱆𑱇𑱈𑱉𑱊𑱋𑱌𑱍𑱎𑱏𑱐𑱑𑱒𑱓𑱔𑱕𑱖𑱗𑱘𑱙𑱚𑱛𑱜𑱝𑱞𑱟𑱠𑱡𑱢𑱣𑱤𑱥𑱦𑱧𑱨𑱩𑱪𑱫𑱬𑱭𑱮𑱯𑱰𑱱𑱲𑱳𑱴𑱵𑱶𑱷𑱸𑱹𑱺𑱻𑱼𑱽𑱾𑱿𑲀𑲁𑲂𑲃𑲄𑲅𑲆𑲇𑲈𑲉𑲊𑲋𑲌𑲍𑲎𑲏𑲐𑲑𑲒𑲓𑲔𑲕𑲖𑲗𑲘𑲙𑲚𑲛𑲜𑲝𑲞𑲟𑲠𑲡𑲢𑲣𑲤𑲥𑲦𑲧𑲨𑲩𑲪𑲫𑲬𑲭𑲮𑲯𑲰𑲱𑲲𑲳𑲴𑲵𑲶𑲷𑲸𑲹𑲺𑲻𑲼𑲽𑲾𑲿𑳀𑳁𑳂𑳃𑳄𑳅𑳆𑳇𑳈𑳉𑳊𑳋𑳌𑳍𑳎𑳏𑳐𑳑𑳒𑳓𑳔𑳕𑳖𑳗𑳘𑳙𑳚𑳛𑳜𑳝𑳞𑳟𑳠𑳡𑳢𑳣𑳤𑳥𑳦𑳧𑳨𑳩𑳪𑳫𑳬𑳭𑳮𑳯𑳰𑳱𑳲𑳳𑳴𑳵𑳶𑳷𑳸𑳹𑳺𑳻𑳼𑳽𑳾𑳿𑴀𑴁𑴂𑴃𑴄𑴅𑴆𑴇𑴈𑴉𑴊𑴋𑴌𑴍𑴎𑴏𑴐𑴑𑴒𑴓𑴔𑴕𑴖𑴗𑴘𑴙𑴚𑴛𑴜𑴝𑴞𑴟𑴠𑴡𑴢𑴣𑴤𑴥𑴦𑴧𑴨𑴩𑴪𑴫𑴬𑴭𑴮𑴯𑴰𑴱𑴲𑴳𑴴𑴵𑴶𑴷𑴸𑴹𑴺𑴻𑴼𑴽𑴾𑴿𑵀𑵁𑵂𑵃𑵄𑵅𑵆𑵇𑵈𑵉𑵊𑵋𑵌𑵍𑵎𑵏𑵐𑵑𑵒𑵓𑵔𑵕𑵖𑵗𑵘𑵙𑵚𑵛𑵜𑵝𑵞𑵟𑵠𑵡𑵢𑵣𑵤𑵥𑵦𑵧𑵨𑵩𑵪𑵫𑵬𑵭𑵮𑵯𑵰𑵱𑵲𑵳𑵴𑵵𑵶𑵷𑵸𑵹𑵺𑵻𑵼𑵽𑵾𑵿𑶀𑶁𑶂𑶃𑶄𑶅𑶆𑶇𑶈𑶉𑶊𑶋𑶌𑶍𑶎𑶏𑶐𑶑𑶒𑶓𑶔𑶕𑶖𑶗𑶘𑶙𑶚𑶛𑶜𑶝𑶞𑶟𑶠𑶡𑶢𑶣𑶤𑶥𑶦𑶧𑶨𑶩𑶪𑶫𑶬𑶭𑶮𑶯𑶰𑶱𑶲𑶳𑶴𑶵𑶶𑶷𑶸𑶹𑶺𑶻𑶼𑶽𑶾𑶿𑷀𑷁𑷂𑷃𑷄𑷅𑷆𑷇𑷈𑷉𑷊𑷋𑷌𑷍𑷎𑷏𑷐𑷑𑷒𑷓𑷔𑷕𑷖𑷗𑷘𑷙𑷚𑷛𑷜𑷝𑷞𑷟𑷠𑷡𑷢𑷣𑷤𑷥𑷦𑷧𑷨𑷩𑷪𑷫𑷬𑷭𑷮𑷯𑷰𑷱𑷲𑷳𑷴𑷵𑷶𑷷𑷸𑷹𑷺𑷻𑷼𑷽𑷾𑷿𑸀𑸁𑸂𑸃𑸄𑸅𑸆𑸇𑸈𑸉𑸊𑸋𑸌𑸍𑸎𑸏𑸐𑸑𑸒𑸓𑸔𑸕𑸖𑸗𑸘𑸙𑸚𑸛𑸜𑸝𑸞𑸟𑸠𑸡𑸢𑸣𑸤𑸥𑸦𑸧𑸨𑸩𑸪𑸫𑸬𑸭𑸮𑸯𑸰𑸱𑸲𑸳𑸴𑸵𑸶𑸷𑸸𑸹𑸺𑸻𑸼𑸽𑸾𑸿𑹀𑹁𑹂𑹃𑹄𑹅𑹆𑹇𑹈𑹉𑹊𑹋𑹌𑹍𑹎𑹏𑹐𑹑𑹒𑹓𑹔𑹕𑹖𑹗𑹘𑹙𑹚𑹛𑹜𑹝𑹞𑹟𑹠𑹡𑹢𑹣𑹤𑹥𑹦𑹧𑹨𑹩𑹪𑹫𑹬𑹭𑹮𑹯𑹰𑹱𑹲𑹳𑹴𑹵𑹶𑹷𑹸𑹹𑹺𑹻𑹼𑹽𑹾𑹿𑺀𑺁𑺂𑺃𑺄𑺅𑺆𑺇𑺈𑺉𑺊𑺋𑺌𑺍𑺎𑺏𑺐𑺑𑺒𑺓𑺔𑺕𑺖𑺗𑺘𑺙𑺚𑺛𑺜𑺝𑺞𑺟𑺠𑺡𑺢𑺣𑺤𑺥𑺦𑺧𑺨𑺩𑺪𑺫𑺬𑺭𑺮𑺯𑺰𑺱𑺲𑺳𑺴𑺵𑺶𑺷𑺸𑺹𑺺𑺻𑺼𑺽𑺾𑺿𑻀𑻁𑻂𑻃𑻄𑻅𑻆𑻇𑻈𑻉𑻊𑻋𑻌𑻍𑻎𑻏𑻐𑻑𑻒𑻓𑻔𑻕𑻖𑻗𑻘𑻙𑻚𑻛𑻜𑻝𑻞𑻟𑻠𑻡𑻢𑻣𑻤𑻥𑻦𑻧𑻨𑻩𑻪𑻫𑻬𑻭𑻮𑻯𑻰𑻱𑻲𑻳𑻴𑻵𑻶𑻷𑻸𑻹𑻺𑻻𑻼𑻽𑻾𑻿𑼀𑼁𑼂𑼃𑼄𑼅𑼆𑼇𑼈𑼉𑼊𑼋𑼌𑼍𑼎𑼏𑼐𑼑𑼒𑼓𑼔𑼕𑼖𑼗𑼘𑼙𑼚𑼛𑼜𑼝𑼞𑼟𑼠𑼡𑼢𑼣𑼤𑼥𑼦𑼧𑼨𑼩𑼪𑼫𑼬𑼭𑼮𑼯𑼰𑼱𑼲𑼳𑼴𑼵𑼶𑼷𑼸𑼹𑼺𑼻𑼼𑼽𑼾𑼿𑽀𑽁𑽂𑽃𑽄𑽅𑽆𑽇𑽈𑽉𑽊𑽋𑽌𑽍𑽎𑽏𑽐𑽑𑽒𑽓𑽔𑽕𑽖𑽗𑽘𑽙𑽚𑽛𑽜𑽝𑽞𑽟𑽠𑽡𑽢𑽣𑽤𑽥𑽦𑽧𑽨𑽩𑽪𑽫𑽬𑽭𑽮𑽯𑽰𑽱𑽲𑽳𑽴𑽵𑽶𑽷𑽸𑽹𑽺𑽻𑽼𑽽𑽾𑽿𑾀𑾁𑾂𑾃𑾄𑾅𑾆𑾇𑾈𑾉𑾊𑾋𑾌𑾍𑾎𑾏𑾐𑾑𑾒𑾓𑾔𑾕𑾖𑾗𑾘𑾙𑾚𑾛𑾜𑾝𑾞𑾟𑾠𑾡𑾢𑾣𑾤𑾥𑾦𑾧𑾨𑾩𑾪𑾫𑾬𑾭𑾮𑾯𑾰𑾱𑾲𑾳𑾴𑾵𑾶𑾷𑾸𑾹𑾺𑾻𑾼𑾽𑾾𑾿𑿀𑿁𑿂𑿃𑿄𑿅𑿆𑿇𑿈𑿉𑿊𑿋𑿌𑿍𑿎𑿏𑿐𑿑𑿒𑿓𑿔𑿕𑿖𑿗𑿘𑿙𑿚𑿛𑿜𑿝𑿞𑿟𑿠𑿡𑿢𑿣𑿤𑿥𑿦𑿧𑿨𑿩𑿪𑿫𑿬𑿭𑿮𑿯𑿰𑿱𑿲𑿳𑿴𑿵𑿶𑿷𑿸𑿹𑿺𑿻𑿼𑿽𑿾𑿿𑾀𑾁𑾂𑾃𑾄𑾅𑾆𑾇𑾈𑾉𑾊𑾋𑾌𑾍𑾎𑾏𑾐𑾑𑾒𑾓𑾔𑾕𑾖𑾗𑾘𑾙𑾚𑾛𑾜𑾝𑾞𑾟𑾠𑾡𑾢𑾣𑾤𑾥𑾦𑾧𑾨𑾩𑾪𑾫𑾬𑾭𑾮𑾯𑾰𑾱𑾲𑾳𑾴𑾵𑾶𑾷𑾸𑾹𑾺𑾻𑾼𑾽𑾾𑾿𑿀𑿁𑿂𑿃𑿄𑿅𑿆𑿇𑿈𑿉𑿊𑿋𑿌𑿍𑿎𑿏𑿐𑿑𑿒𑿓𑿔𑿕𑿖𑿗𑿘𑿙𑿚𑿛𑿜𑿝𑿞𑿟𑿠𑿡𑿢𑿣𑿤𑿥𑿦𑿧𑿨𑿩𑿪𑿫𑿬𑿭𑿮𑿯𑿰𑿱𑿲𑿳𑿴𑿵𑿶𑿷𑿸𑿹𑿺𑿻𑿼𑿽𑿾𑿿𑿀𑿁𑿂𑿃𑿄𑿅𑿆𑿇𑿈𑿉𑿊𑿋𑿌𑿍𑿎𑿏𑿐𑿑𑿒𑿓𑿔𑿕𑿖𑿗𑿘𑿙𑿚𑿛𑿜𑿝𑿞𑿟𑿠𑿡𑿢𑿣𑿤𑿥𑿦𑿧𑿨𑿩𑿪𑿫𑿬𑿭𑿮𑿯𑿰𑿱𑿲𑿳𑿴𑿵𑿶𑿷𑿸𑿹𑿺𑿻𑿼𑿽𑿾𑿿𑿀𑿁𑿂𑿃𑿄𑿅𑿆𑿇𑿈𑿉𑿊𑿋𑿌𑿍𑿎𑿏𑿐𑿑𑿒𑿓𑿔𑿕𑿖𑿗𑿘𑿙𑿚𑿛𑿜𑿝𑿞𑿟𑿠𑿡𑿢𑿣𑿤𑿥𑿦𑿧𑿨𑿩𑿪𑿫𑿬𑿭𑿮𑿯𑿰𑿱𑿲𑿳𑿴𑿵𑿶𑿷𑿸𑿹𑿺𑿻𑿼𑿽𑿾𑿿𑿀𑿁𑿂𑿃𑿄𑿅𑿆𑿇𑿈𑿉𑿊𑿋𑿌𑿍𑿎𑿏𑿐𑿑𑿒𑿓𑿔𑿕𑿖𑿗𑿘𑿙𑿚𑿛𑿜𑿝𑿞𑿟𑿠𑿡𑿢𑿣𑿤𑿥𑿦𑿧𑿨𑿩𑿪𑿫𑿬𑿭𑿮

该书据说乃由至德周氏师古堂印行，周启群注意到其出版时间是在1951年7月之后，而不是扉页所题的1950年7月^①。若要说得再确切一些，该书刊印于1951年7月至12月之间。1951年12月23日，邓之诚在日记中提到：“晨，高名凯来，王钟翰来，送《周叔弢纪念论文集》。予所撰《题归来草堂录》，错字不可胜数。”^②12月25日，顾廷龙亦“得一良寄乃翁《六十纪念集》”^③。1952年1月23日，顾颉刚“看《周叔弢六十纪念论文集》”，次日“看《周叔弢纪念集》”^④。这说明最迟在1951年12月23日之前已经印行。

周一良在约稿编书的过程中，收到了谢国桢（刚主）寄赠的《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胡适、蔡元培、王云五编辑，商务印书馆，1937年6月再版本）。周一良在此书上写了两条题记：

此家大人六十生日谢刚主先生所赠也，一九五零年七月，一良记。

解放前祝嘏之纪念文集只有蔡元培、金毓黻及此册而已。解放初有《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日本无虑有百余种矣。

《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一书印制并非精良，印数不多，但内容丰富，学术水平很高。1950年1月17日，天津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周叔弢（启新洋灰公司经理）当选为副市长^⑤。6月22日，周叔弢以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身份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呼吁要“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

① 周启群：《〈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说略》，《澎湃新闻》2021年6月18日网络版。

②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册，第622页。

③ 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第595页。

④ 《顾颉刚日记》第七卷（1951—1955年），第178页。

⑤ 《津二届各界代表大会结束 黄敬刘秀峰周叔弢当选市长副市长 各界协商委员会委员卅三人同时选出》，《人民日报》1950年1月18日第一版。

的好转而斗争”^①。在这样的时局下，该论文集自然要合乎时宜，不能过于铺张，去追求精制豪气。

1956年10月21日，周一良致函顾廷龙：“家父纪念论文集，当时因经费关系，只印二百部，弟处已无存。孙氏弟兄处是否有存者亦不知，不妨再函询也。”^②“孙氏弟兄”即名列五编委中的孙师匡、孙师白。因印数少，该书在市面上颇为难寻。周一良曾于1988年寻到一册，并写了题记：

我国纪念论文集，解放前唯有蔡孑民、张菊生、金毓黻先生等三种，此册为解放后第一册。惜弢翁七十、八十、九十生日限于环境，竟不能再编。此册作者阵容当时颇为难能可贵，然廿九人中已有十七人作古。余当时三十八岁，今又已三十八年矣。旧藏一册“文革”中被抄走，闻香港有海盗版，今无意于津寓检得，携归作为纪念。八八年四月 记于燕东园 一良

“闻香港有海盗版”，是指香港龙门书局1967年盗印版。周一良收藏并题字的此册在其身故之后散落市场，后来辗转入藏其堂侄周启晋之手。目前该书中又新加了周启群、周启晋的两篇跋文，在在体现了该书与周氏家族的一段奇妙的因缘。

（四）中国历史学会亚洲组的工作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一良与季羨林共同参加了一些学术组织，仍然保持了较多的联系。1951年4月16日，周一良致函季羨林，涉及新成立的学术组织中国历史学会，具体内容如下：

羨林兄：

大作二次校样送上，乞早日校阅寄还。如错误犹多，尚可看

^① 《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叔弢的发言》，《人民日报》1950年6月24日第三版。

^② 《周一良全集》第十册，第29页。

第三次也。新史学会其他各组第一次集会多为讨论座谈计划及进入方式。亚洲史组恐亦以如此作为宜。吾兄如亦不识陈翰笙，可否请就近一探其工作地点，弟当与我兄择日一往拜访，以为何如？陈先生为社会科学界老前辈，希望亚洲史组能得渠多负领导之责也。再新史学会所定日期为第四礼拜日，适值清华校庆（四月廿九日），不知可否提前一天？并乞考虑！（是日城郊往返交通极弱，甚不方便也。）匆匆即致
敬礼！

弟 一良 上 五一、四、十六

所谓“大作二次校样”应该就是指季羨林的《记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梵文原本的发现》一文，当时还在校对过程之中。“新史学会”是指1949年7月1日在北平筹备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宋云彬在当天的日记中提及：“下午三时，赴北平饭店出席新史学研究会发起人大会，讨论章程草案，成立筹备会。”^①在次日《人民日报》公布的筹备人员名单中，有王重民、向达、王伯祥、宋云彬、邵循正、范文澜、唐兰、陈垣、郭沫若、吴玉章等人^②，而没有季羨林和周一良。7月9日，王伯祥在日记中转录了《文汇报》的相关消息：“《文汇报》今载北平通讯，新史学会已于七月一日成立筹备会，沫若被推为常务主任委员，余名已列入发起人名单中，沫若外，西谛、予同、伯赞、辰伯、觉明、心田、谷城、仲沅诸人俱列焉。平中办事之明快如此，不能不令人感动已。”^③7月11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则对此事吐槽：“报载北平成立新史学研究会，在南方之伯祥、寿彝皆在，而无予名，予其为新贵所排摒矣。”^④

① 宋云彬：《红尘冷眼》，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8页。

②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昨在北平成立》，《人民日报》1949年7月2日第二版。

③ 王伯祥著，张廷银、刘应梅整理：《王伯祥日记》，第十册，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4299页。

④ 《顾颉刚日记》第六卷（1947—1950），第484页。

此“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后正式定名为“中国史学会”，1951年7月28日在北京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夏鼐当天的日记：

上午参加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范文澜先生为主席，由郭沫若、吴玉章二先生先后致辞，……郑振铎秘书报告会务。陈翰笙来宾致辞。然后通过会章，选举理事。理事候选人名单中，考古所有郑振铎、徐旭生、郭子衡与我，共4人；北大有向达、罗常培、汤用彤、唐兰，而无郑天挺（系主任）；清华有邵循正、吴晗，而无雷海宗、周一良。其他如顾颉刚、柳诒徵等人亦皆除外。共有理事43人、候补理事9人，尚待各地选举票来齐后，再行开票^①。

夏鼐的日记中特别提到理事名单中没有周一良。当时周一良恰好也不在北京，他到四川参加土改运动去了。邓之诚的日记对此有所记载。1951年5月25日，“周一良来辞行，即日赴川参加土改”^②。7月20日，第五十一次清华大学校务工作会议决议，同意邵循正教授因体弱原因辞去历史系主任一职，新聘周一良为系主任。周一良参加土改期间，系务由丁则良（召集人）、孙毓棠、陈庆华三人小组共同负责^③。9月中旬，周一良完成土改工作回到成都，据《万物图行杂字》的题记“1951年9月19日买于成都，一良”。又，《赵望云西北旅行画记》的题记：“1951年9月参加川西土改工作归途在成都夜市购得此册，明日即将取道宝鸡返京也。9月20日一良记于春熙路招待所。”^④10月6日，

① 夏鼐：《夏鼐日记》卷四（1946—1952），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12页。

②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册，第571页。

③ 《函复邵循正准予辞去历史系主任并请周一良继任》，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档案编号2-259-51014-007。《函请周一良为历史系主任》，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档案编号2-259-51014-016。《函请丁则良、孙毓棠、陈庆华三位在历史系主任周一良未返校前组成临时工作组进行工作》，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档案编号2-259-51014-014。

④ 《周一良全集》第九册，第426页。

“周一良新自眉山土改归来，馈什坊淡芭菰一合，十小匣”^①。

对中国史学会的成立，顾颉刚、邓之诚等也有所关注。1951年7月26日，邓之诚“得史学会通知：后日开成立大会，通过章程，选举理事。本欲开全国大会，大约未请得经费，不事铺张矣”。7月30日晨，邓之诚与王钟翰谈话，“言前日史学会成立，预定名单五十二人，选理事四十二人，候补九人，皆预定，而无贱名，正合孤意”^②。王伯祥虽作为筹备者之一员，但7月28日的会议却因公事繁忙而未克出席，“余今日九时本有史学会成立大会之约，以不能分身，属佳生代言不能到之故。午后，佳生返馆，知章程已通过，选举理事结果则尚未揭晓耳”^③。据说季羨林当选了该学会的理事。

周一良虽不是中国史学会的理事，但从周一良的这封来函中可以看出，他和季羨林一起参加了中国史学会的相关工作，具体来说，就是学会下属的亚洲史组的工作。该组的领导者应该是陈翰笙，具体的组员有向达、季羨林、张礼千、周一良、马坚、张秀民、余元盒等十余人。^④亚洲史组这个平台为周一良、季羨林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受抗美援朝的影响，周一良陆续撰写了中朝关系史的一些论文，比如，《中国与朝鲜的历史关系》（《新建设》第三卷第三期，1950年12月）、《从印刷术看中朝文化交流》（《进步日报》1950年12月26日）、《东学党——朝鲜的反封建反帝斗争》（《历史教学》月刊创刊号和第2期，1951年）、《中朝人民之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人民日报》1951年2月13日第三版、14日第三版）等。现存季羨林1950年代初期所写的一张便签，具体内容如下：

周一良：一八九五至一九一〇年的中朝关系。

①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册，第588页。

② 同上书，第578—579页。

③ 王伯祥著，张廷银、刘应梅整理：《王伯祥日记》第十一册，第4685页。

④ 张秀民：《忆与向觉明先生交往的琐事》，《书品》2004年第3辑，收入沙知编《向达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25—128页。

张礼千：马来民族问题。

丁则良：/ 李有义：/ 马坚：/ 金克木：印度教。/ 季羨林：/ 白寿彝：/ 郑天挺：/ 向达：

这是一张约稿人的名单，存在两个可能，其一，为《史学周刊》约稿。据1951年3月季羨林《史学周刊发刊》的消息：“《史学周刊》已于一月十二日发刊，该刊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清华大学历史系、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三机联负责编辑，采取二、二、一期轮流编辑制，即北大历史系编二期，清华历史系编二期，近代史研究所编一期，每期约一万五千字，分在天津《进步日报》及上海《大公报》两报刊载，现已出刊三期。”其中就有丁则良、向达、郑天挺、季羨林等人的论文。其二，有可能是为天津新出《历史教学》月刊的约稿，该刊创刊号就有周一良、李有义（《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西藏政府》）、丁则良（《关于宋初王小波李顺的起义》）三人的稿件。这份名单上所列的“一八九五至一九一〇年的中朝关系”正是周一良1951年前后关注的研究领域。当年他在开明书店就出版了《中朝人民的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一书。这些活动也为日后周一良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率领师生开拓亚洲史研究的新领域提供了契机。

1950年代的新中国积极推进与新兴民族国家尤其是邻近民族独立国家及亚洲各国的关系，形成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共同推进反对殖民主义的解放斗争之中。1953年10月29日，常任侠的日记记载：“下午六时，丁西林部长邀往萃华楼晚宴，到郑振铎、周一良、金克木、季羨林、阴法鲁、周克刚等，商讨撰一论文，在印发表。丁部长有所咨询，希望提供资料。”^①周一良、季羨林等学者经常讨论与亚洲研究相关的问题。陈翰笙等学者还组织成立国际问题研究所等相关机构。在中国科学院第一个五年（1953—1957）计划纲要中，1956年拟

① 常任侠：《常任侠日记集：春城纪事（1949—1953）》，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728页。

完成的计划之五是“建立亚洲研究所（设北京），研究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问题。”在《中国科学院1955年度科学事业发展规划（草案）》中，1955年准备增设五个的研究机构包括了“亚洲史研究所（北京）”。^①1955年12月14日，哲学社会科学部向院务常务会提交报告，汇报筹备建立亚洲研究所的工作。一方面，与外交部商议，拟将该部南亚组全部工作人员移交科学院，接交工作具体由刘桂五、毕季龙、张之毅三人共同负责，并再调配相关研究人员加入团队。另一方面，拟先行成立亚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由陈翰笙、乔冠华、章文晋、向达、周一良、季羨林、郑森禹、庄涛、王任叔、杨人梗、周故城、李纯青等十三人组成，并由陈翰笙担任主任委员”^②。时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此前致刘大年的一封信函中，也提及洛甫同志要将外交部的“东南亚诸国研究室（陈翰笙），……拟交科学院接管。如科学院不能接管，只好精简掉。我请他勿精简掉，并说科学院因要成立亚洲史研究所，需要有一个底子，外交部的这一摊是可作底子的”^③。虽然亚洲研究所未能成立，但周一良、季羨林在亚洲研究方面的成绩得到了组织的认可。

余 论

2001年10月26日，季羨林在《悼念周一良》一文中，将相交相知五十余年的老友周一良定义为“一个有骨气有正义感的书生”，高度评价了他的学术水平（“巍然大师，海内无出其右者”）和深厚的爱国情操（“他始终无怨无悔地爱着我们这个国家”）。周一良与季羨林的出

① 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 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

② 《哲学社会科学部关于准备筹备建立亚洲研究所的报告》，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处藏，院档编号55-2-13。参见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 1955年》，第122—123页。

③ 王玉璞、朱薇编：《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59—160页。此信应该写于1955年，而不是1956年。

身和前期求学有很大的差别。但两人均在海外求学多年，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在学术上有一些共同的兴趣点。正如王邦维老师最近指出的：“两位先生的研究，很多地方相互关联。而且重要的还有一点，那就是，让两位先生在研究上相互关联、相互注意的，大多是一些近代东方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或者关键节点。”^①在二战胜利之后，季羨林、周一良先后回国，虽然分别在北大和燕京大学执教，但是，如季羨林所说：“此时我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已经有一部分相同了。因为我在德国读梵文，他在美国也学了梵文。既然有了共同语言，订交自是意中事。”季羨林的归国日记中留下了两人初期的学术交往。周一良撰写的《中国的梵文研究》《能仁与仁祠》《论佛典翻译文学》《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牟子理惑论〉时代考》《跋敦煌写本〈法句经〉及〈法句譬喻经〉残卷三种》等论文，涉及梵汉佛经文献研究与丝绸之路的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研究，都是季羨林相当感兴趣的研究课题。

从相互的交谈、帮助查找学术资料、审读论文提出建议、引证观点并加以深化、邀请学术讲座，到共同创办中国东方语文学会，定期聚会讨论，书信往来、赠送图书、互通信息，以及支持刊物建设，两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加深了，友谊增强了，一直到现在，五十余年间并未减退”^②。在1947年初次订交之后，到1950年代，两人同在北京大学执教以来，共同努力推动中国东方学的发展。季羨林赠送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等著作一直被周一良收藏，该书上的题记为“羨林同志见赠，一良，一九五八、八”。周一良名下指导的研究生周清澍被安排学习印度史，“周先生自谦不能指导印度史，另请东语系季羨林先生指导，并亲领我去东语系面见导师。……他带我去外文楼引见导师季羨林先生。……在两位先生的警示下，我更深刻意识到外语对专业

① 王邦维：《记周一良先生所赠西文藏书》，《文汇报》2023年1月7日第八版“文汇学人”。

② 季羨林：《悼念周一良》，收入季羨林《季羨林全集》第三卷“散文三”，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275—278页。

的重要性和自己的严重缺陷”^①。周清澍1999年12月4日在致马少侨的一封信中，回忆自己的学习经历“不久，我被调出脱产学习俄文，又调往马列学院旁听，先后师从苏联专家、杨人梗、周一良、季羨林诸先生学世界近代史、亚洲史、印度史，眼光盯住西洋、东洋，很少注意中国史学界信息”^②。正是周一良、季羨林的联手培养，周清澍才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

1987年5月，季羨林在东语系指导的第一位印度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王邦维“博士论文完成，周先生是论文的评阅人之一，正式答辩时，又是答辩委员会的成员”^③。周一良与季羨林在合作培养学生方面的时间跨度很长。就研究范畴而言，周一良不能单单看作是新中国亚洲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④，也应该被视为中国一流的东方学家，就像他的老友季羨林那样。

从归国之后的学术发展来看，虽同样受陈寅恪的影响而走上学梵文之路，但周、季两人的取舍有所不同。季羨林基本是以印度学为主科，旁及中印文化交流史等多个相关领域。而周一良更类似陈寅恪先生，不是以语文学为重，而类似周一良在《纪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所总结的那样：

陈先生开辟了运用文学作品阐述历史问题，又利用历史知识解说文学作品的崭新途径，左右逢源，令人叹服。陈先生渊博的梵文以及满、蒙、藏文知识，使他的学问具备另一特色。他不仅利用汉文以外的语文学从对音和译义来考察汉文佛典、史书与诗文，还探索中国与印度在宗教思想以及文章体裁上的关系与影

① 周清澍：《回忆周一良师》，《文史知识》2008年第7期，第116—125页。

② 周清澍：《致马少侨先生的一封信》，《邵阳文史》第28辑，2000年，第339—343页。

③ 王邦维：《记周一良先生所赠西文藏书》，《文汇报》2023年1月7日第八版“文汇学人”。

④ 林承节：《周一良先生是新中国亚洲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北大史学》第1期，1993年，第109—119页。宋成有：《周一良先生的为学与为人》，《南开日本研究》，2011年，第321—352页。

响，树立了如何深入研究文化交流和比较文学的光辉典范。^①

周一良在归国之后所发表的论文，其研究路数与陈寅恪先生颇有几分相似之处。这些与梵文或多或少有些关系的研究成果既进一步开拓了当时国内东方学研究的新颖性，也奠定了周一良的学术地位。然而由于历史风云的变幻、个人道路的选择等诸多因素，周一良的研究之路发生了许多的变化。正如其好友谭其骧在1978年10月3日的信中所说：“吾兄自五十年代以来，虽声名洋溢于一世，然论学术上成就，窃以为转不如解放以前，其故当由于改行不得当，非业务活动太多之故。”^②在季羡林看来，周一良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联陞），虽然在学术上也有所表现。但是，格于形势，不免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③然随着两位先生的远去，那无言的遗憾与淡淡的伤感也飘逝在风中，无影无踪。

① 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毕竟是书生》，第130—149页。

② 周一良：《纪念老友谭其骧教授》，原载《文汇报书周报》1993年7月3日第六版。此见《周一良全集》第九册，第140页。

③ 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百年潮》1999年第7期，第10—16页。